

製作族跡：《揚州休園志》的 家族記憶與文本建構

葉叡宸*

〔摘要〕

《揚州休園志》是一部清代揚州鄭氏的家族紀錄，作者以園林為書寫的記憶核心，試圖呈現祖脈系譜、建構家風，同時形塑祖先，呈現「家族榮光」。本文將說明休園的空間意義，如何和傳統士人稱許的美德懿行、倫理、公益實踐產生緊密連結，進而詮釋《揚州休園志》如何譜寫鄭氏家族在公、私領域的深刻記憶圖像。最後，藉由《揚州休園志》思考當時有關園林作為一種「傳家話語」的意義，並以之觀看明清士大夫的家族意識與內涵，希望具體而微地呈現明清地方士大夫家族的側影和自我表述的書寫活動意義。

關鍵詞：休園、揚州、《揚州休園志》、製作、家族記憶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中，造園是重要的人文活動、文化現象。明清兩代，築園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潮，反應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態、社會風尚、人文活動、士人心態的多元圖像。¹作為士人生活與生存的主體空間，無論是：家居、遊憩、社交，園林儲藏了豐富的人地精神與人文記憶，能呈顯士人生命史的多重面向。學界過往對中國園林的討論，多集中在士大夫個體價值、生命理念追求與實踐的範疇。有關園林空間與家族交涉共構的「集體意志」和心態，是一待開拓、深化的課題。對於士大夫而言，園林不只是個人休憩自養、遺世獨立的微型天地，也是一家一姓立足顯世的重要憑藉。但在士人家族世代交棒、相續的過程中，園林以其物質性的存有狀態，呈顯家姓發展痕跡，同時也在「傳承」的概念上，體現士人面對傳統家庭（族）、社會價值的心態，以及相對應的行動實踐。

在中國園林文化的發展中，有關園林和士大夫家族傳承的關聯性，往往引發時間與存有的思索。唐代李德裕（787-849）諄諄告誡子孫應努力護持園林，完璧持守，方能不違先人心意，可稱為佳子孫。²又如晚明王世貞（1529-1593）《古今名園墅編·序》感嘆：「若夫園墅不轉盼而能易姓，不易世而能使其遺蹤逸跡泯沒於荒煙夕照間，亡但綠野、平泉而已，所謂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³其又言：「余徐謂：『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稱至鉅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綠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介蒂。而宋時李文叔之所記，無一為其子孫有者。』」⁴擁有豐富遊園經驗以及造園心得的王世貞，從上林、甘泉昆明、太液等帝王苑囿、裴度的綠野莊與李德裕的平泉莊等名人世家，或是《洛陽名園記》觀察都市豪富巨家的園林群落，提出「園」

¹ 參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王鴻泰：〈明清間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年3月），頁1-44。

² 〔唐〕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李衛公別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9，頁290。

³ 〔明〕王世貞：〈古今名園墅編序〉，《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崇禎年間刊本），卷46，頁2412。

⁴ 〔明〕王世貞：〈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萬曆年間世經堂刊本），卷74，頁3565-3570。

所呈顯「變」的一項時間性思索：園林當下的物質性狀態愈盛，似乎就愈難久存，帶來園林「不易世」即落入時代煙燼，是園林生命史的常見現象。

相對於整體「時代」、「國」，園林成毀以至消亡，也映照一姓「家族」盛衰的命運顯像。黃與堅（1620-1701）作客無錫寄暢園，頗有感慨：「昔鄒愚谷先生，為園於惠山也，以山之山為其山，山之水為其水，重樓複榭，叢臺曲館，彌亘於九龍之山，足猝而舉之，莫既其勝也。不三世而割裂剖析，屬於他姓，其僅者存，則又傾圯頽壞，悉蕩為寒煙蔓草不可復矣。」⁵言晚明鄒迪光（1549-1625）打造愚公谷，在家鄉無錫銘刻人地記憶，縱有締構智巧精妙，不免易姓，失修失傳，存者朽毀，使觀者慨然再三。相對而言，無錫寄暢園從明代秦燿建成後，一脈承傳。入清後，子孫秦寶瓚（1856-1928）言自家園林：「噫！斯園之盛衰，與吾家相終始。」⁶指出「園」與「家」在盛衰意義上的聯繫。綉谷園在蔣垓（？-？）逝後三易其主，垓孫蔣深重復故園，嚴虞惇（1650-1713）讚美其「迪惟前人光，茲園之作，可為曰孝」⁷足見「園」之興立，和家族倫理精神（孝）的發揚相互黏著，為一家一姓的盛衰象徵。因此，一座「能承傳」以及「被承傳」的園林，象徵著士人對傳統倫理價值的實現。園林的生命史等同家族的興衰史，也是傳統中國士大夫認知、想像以及指涉乃至於建構「家族」的重要語彙。我們能從中探知家族社會形象與家族內部情感記憶的諸多面向，以及探究在特定的時空背景、歷史脈絡中，園林如何作為可資表述、言說的語彙。⁸從此角度而言，園林書寫呈現不同世代交相延續的心態、思考，可從中觀看士人面對「家族」的相關價值追求、實踐。

若欲踪索園林與家族的聯繫，可從相關的文字、圖像紀錄中，探討其意義。唐代以前，園林書寫多為單篇園記、詩歌、雜文，相關紀錄多集中在文人別集、

⁵ [清]黃與堅：〈錫山秦氏寄暢園記〉，[清]秦國璋：《寄暢園志》，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2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影印民國五年〔1916〕抄本影印），卷6〈藝文下〉，頁174。

⁶ [清]秦寶瓚：〈寄暢園志序〉，[清]秦國璋：《寄暢園志》，卷6〈藝文下〉，頁145。

⁷ [清]嚴虞惇，衣學領主編，王稼句編注：〈重修綉谷園記〉，《蘇州園林歷代文鈔》（上海：三聯書局，2008年），頁105。

⁸ 如明清鼎革之際，園林乃是可資政治、文化身份表述的論題。游勝輝即通過蕭家兩代的園林經營與書寫，指出遺民經營家族、延續生存策略的議題。游勝輝：〈遺民·逸民·鄉紳：明遺民二代蕭伯升之家聲延續與志意詮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9期（2023年5月），頁103-145。

私家筆記與方志。唐宋以來，出現園林景圖與分景題詠的詩歌。⁹明代中葉，伴隨築園風氣的興盛，時人也有意識結合單篇的園林記文與圖像，譬如文徵明（1470-1559）為好友王獻臣拙政園繪製三十一景，《拙政園三十一景圖》採取圖文並列的形式。在每一分景圖中，繫以對應詩作，詩前小序解釋景點方位、設置緣由、景色涵義。將圖、文合併於一，使園林詩、文、圖三者為一體，產生緊密連結。此外，也出現介紹園林的專書，王世貞依據《古今游名山記》體例，將遊觀園林的各類紀錄，彙整為《古今名園墅編》。王氏言：「虬集古今之為園者記、志、賦、序幾百首，詩古體、近體幾百千首，而別墅之依於山水者亦附焉。」¹⁰鄒迪光《愚公谷乘》收錄自家園林「愚公谷」的園林書寫，包括自撰十一篇園記及自我和友朋賓客雅集的相關詩歌題詠。崇禎末年，祁彪佳（1603-1645）先後編有屬於自家園林的《寓山志》與紀錄紹興地方諸園的《越中園亭記》。前者匯集私家園林相關書寫，開創個別園林叢書形式，包含圖、文、詩，分卷收錄不同體類作品。《越中園亭記》收錄祁彪佳家鄉紹興園林群像，遙承北宋李格非（?-1106）《洛陽名園記》、南宋周密（1232-1298）《吳興園林記》紀一地園林群志系統，以時、空經緯交織的文本結構，呈現個人遊賞、探查、考察的園林序列。¹¹

園林專志可謂伴隨園林文化成熟而出現的特殊著作，通過園林空間書寫為寫作、編輯主題的「園林志」，有助於我們對人地關係、社會風氣、特定群體意識的判讀和掌握。當中蘊含特定的社會文化史、文學史的意涵。類似晚明遊覽專志的引領特質，園林志作者採取圖、文型態，試圖展現園林蘊藏的主體意志與情意，反映了文人有意識接受、回應當時社會形成的休閒、遊觀文化，具「介紹」、「導引」的特性。而叢書主題式的文本創作，則呈顯當時圖書編輯與出版盛行的社會史意義；¹²就文學史的意義而言，從原本單篇的園林詩文紀錄，擴展到「園林專志」，

⁹ 曹淑娟從文本空間的角度，說明由唐至晚明的園林書寫如何伴隨文人園林的成熟，逐漸從大型聯章詩文發展，進而成為園林專志的編刊，形成清楚體例。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9年），頁41-42。

¹⁰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86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卷46，頁5a-5b，總頁403。

¹¹ 參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導論》，頁30-32。

¹² 曹淑娟認為此類園林文本能具體呈現園林空間與遊覽動線，創造臥遊紙本的可能。又舉祁彪佳編纂寓山專志例證，其藏書世家熟悉圖書編輯、出版的實踐，見氏著：《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導論》，頁31-33。

編輯者有意識環繞特定主題，進行多元的搜羅、編選，說明該文學門類成熟，也意味文人自覺以園林作為表抒情志、展現自我生命型態的途徑。從文獻學的角度而言，園林志性質介於地方志、詩文總集之間，體現不同典籍表現形態交涉匯通的成果。

延續明代園林專志的編輯現象，清代園林專志大抵可分為三類型：一般私家園林專志、以特定人文典範為主題的地方園林志、追復家族記憶的園林志。一般私家園林專志承繼過往文人園林志的寫作內容與表現型態，主要以園林空間景觀、雅集聚會、居遊活動為寫作對象。除有記文說明園林建構的過程與整體空間意義說明外，乃以園林分景詩、特定雅集與文會題詠為內容。地方園林志則是編輯者選取地方特定典範人物，集結有關園主生平行跡、園林空間的史地資訊、歷來園林文章。追復家族記憶的園林志則以家族園林為主題，編輯者為園林主人的後代，針對園內分景加以說明、介紹，或紀錄相關人物的遊觀感知。¹³

以「家族」為書寫核心的專志，編輯者出於景仰「先人」與「家風」，希望以園林為中介，透過各種體類書寫的記憶追想，進行家族人物生命情志的想像與建構，期使家風再現、祖德光耀。家族園林志跨越單一園主個體生命形態的連結，觸及「世代」、「家（族）」，具有相對廣泛的時、空跨度面向。藉家族園林志，讀者得以掌握特定家族士人（園主）、士人群體，乃至於士人文化在當時的樣貌與圖像。《揚州休園志》即是一重要的例證，反映了明末清初士大夫家族以文字書寫維繫家族記憶的典型個案，值得深入探討。

鄭氏為明末清初揚州地方大族，先祖本居安徽歙縣，從鄭景濂開始，棄農從商，攜母由歙縣入籍揚州，並透過鹽筴起家。其後，家業三傳至孫輩：元嗣（？-？）、元勳（1604-1645）、元化（？-？）、俠如（1610-1673）。據《揚州畫舫錄》載：「鄭氏數世同居，至是方析箸。兄元嗣，字長吉，構有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王氏園，超宗有影園，贊可有嘉樹園，士介有休園，於是兄弟以園林相競矣。」¹⁴元勳、俠如以文名顯耀，元勳曾於影園中舉辦「黃牡丹詩會」並輯《影園瑤華集》，對晚明江南園林與士人文化、社交、文學圈有重大影響力。¹⁵明末，元勳死於揚州

¹³ 有關清代園林志的類型、特質，見葉叡宸：《地因人重，即景見心：清代地方園林志的典範追尋與文本重構》（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年），頁10-12。

¹⁴ 〔清〕李斗撰，涂雨公、汪北平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8，頁179。

¹⁵ 有關黃牡丹詩會始末、內涵與文化意義及鄭元勳影園的研究可參大木康：《冒襄和影梅庵憶語》

兵亂，影園也從此毀敗。俠如則於崇禎末年登榜，然於其兄死後方入仕。南明亡後，俠如拒絕清廷徵聘，選擇退歸，建設休園自養，在新時代中，承繼、恢復了影園與鄭氏家族和當時江南士人的文化連結。¹⁶俠如之後，其子鄭為光參與科考、入仕新朝，位至御史，賦予家族形象更多的意涵。在不同世代之中，休園見證了明清易代後鄭氏家族生存、發展與實踐的概況。前人大多關注休園與鄭氏形態的關聯性，取《揚州休園志》為家族史證據，留意揚州鄭氏士商混合的家族特徵，以及休園在揚州地方史上的意義。¹⁷至於園志文字書寫「何以能」以及「如何能」傳承的問題，以及《揚州休園志》作為文學文本的意義建構，尚待探索。

《揚州休園志》記錄鄭氏八世，依序為：歙縣祖鄭良鐸（？-？）、遷揚祖鄭景濂（？-？）、鄭之彥（？-？）、鄭俠如、鄭為光（？-？）、鄭熙績（？-？）、鄭玉珩（1692-1738）、鄭慶祐（？-？）。¹⁸俠如建設休園之後，園共歷三次重修，相對於實體性的葺復，園林文字的集結工作也為鄭氏子孫措意。鄭為光即著手編纂《休園志》；¹⁹鄭玉珩蒐羅園記詩章成《三修休園集》；乾隆年間，鄭慶祐於先人編纂基礎上，邀集四方投贈，集大成為《揚州休園志》，逐步擴充，結構更詳整，收錄文類更豐。內容主要關於鄭氏家族人物、園林的介紹，包含卷首：序文二篇、凡例十則、圖繪二幅（休園圖、家祠圖）、遷揚世系八條、列景三十二則（含楹聯、法書、題詩）、目錄八卷。卷一：園記七篇、賦二篇、書後二篇。卷二：壽序十五篇。卷三有鄭氏成員書序二十二篇、跋二篇。卷四：人物傳記八篇、誄二篇，卷五：墓誌五篇、祭文十四篇。卷六：行狀十一篇。卷七與卷八收錄園林相關詩歌題詠，共計 236 首。在多元的文體與記錄主題中，呈現豐富詳實的家族記憶畫面。

就內容來說，明清時期，士大夫的家族型態、組織形構出更為緊密、嚴整的存續模式，相關家族文獻、文本的編輯，反映了此際士人如何體現家族傳承的傳

（臺北：里仁出版社，2013 年），頁 35-35。蔡佳穎：《鄭元勳影園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9 年）。

¹⁶ 據載：「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見〔清〕李斗撰，涂雨公、汪北平點校：《揚州畫舫錄》，卷 8，頁 180。

¹⁷ 馮劍輝：〈明清徽商「脫賈入儒研究」以歙縣長齡鄭氏為中心〉，《黃山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2008 年 8 月），頁 19-26。

¹⁸ 有關《揚州休園志》載錄的鄭氏世系，可參看附錄一作者繪製整理的鄭氏家族八世系譜圖。

¹⁹ 〔清〕李斗撰，涂雨公、汪北平點校：《揚州畫舫錄》，卷 8，頁 180。

統價值。²⁰《揚州休園志》雖以園林為題，敘述祖宗世代與相關人物事蹟，以及整體家族發展歷史的紀錄，建構世系傳承、梳理家族重要人物行事紀錄，賦予類似「家譜」的典籍特色。有關「家（族）譜」的發展可追溯至傳統譜牒（如：周譜），由譜（表）、牒兩部分組成，即世系、家傳合稱，²¹早期多見於皇族世家、名門望族。宋代後平民私家家譜盛行，譜例型態更多且完備。大抵而言，家譜包括人物傳記、世系圖表、藝文等內容。²²鄭慶估言「畧倣志書之體」²³纂成《揚州休園志》，反映清代方志「譜志合一」的現象。²⁴《揚州休園志》以園而不以姓氏為名，亦無譜表、世系圖，嚴格而言，並非傳統的家譜，但內容包含世系、家祠（圖）、壽文、傳記、著述、祭文、藝文，²⁵實涵括一般家譜體例項目。就編輯作意而言，族譜、家譜或家乘目的在「明血統」、「序昭穆」，²⁶含有「生存」與「發展」需求。²⁷而《揚州休園志》卷首以「世系」領銜，鄭慶估自言：「遵家譜之例也」、「文

²⁰ 參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²¹ 譜為先秦紀錄世系書籍之總稱，司馬遷纂《史記》之「表」，多由譜轉化，即以列表法紀錄一家一族的世系發展。譜多列名，而牒則是表之注解，包含該人物的其他訊息（排行、生卒、歷官、妻妾、子女……），見倉修良：《譜牒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7年），頁371-373。

²² 廖慶六分析傳統族譜體裁，包含：世系、家傳、源流、輩序、族規、家訓、祠宇、塋墳、服制、藝文。就世系與人名類型而言，分歐、蘇、程、柳四大類，見氏著：《譜牒學研究》（臺北：萬卷樓，2013年），頁1-37。羅香林則就現存中國各地族譜，歸納內容如：宗支世系、祠宇墳塋、科第仕宦、家訓教育、職業生計、家族人物、藝文著述。見氏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香港中國學社，1971年），頁306-310。

²³ 〔清〕李光地：〈三修休園記〉，見鄭慶估編纂：《揚州休園志》，頁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62。

²⁴ 江藝平：〈現代族譜體例探索〉，《臺灣源流》第94、95期（2021年5月），頁18。

²⁵ 清代家譜類目包含：名字、世系、傳記、著述、家規、家法、家訓、族規、恩榮錄、凡例、字輩、譜論、科舉、墓圖、墓誌、五服圖、家禮、壽文、賀文、祭文、名績錄、契約、藝文、遺像、贊詞、仕宦、行狀、志錄、年表、餘慶錄。同前註，頁18。

²⁶ 倉修良：《譜牒學通論》，頁33。

²⁷ 胡汝民提到：「家譜家譜是人類以血緣為核心的親緣關係的投影。作為家譜核心和基本內容的世系認同，是人類為求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倫理法則之一」。參氏著：〈試論家譜研究及其資源開發〉，《臺灣源流》第46、47期（2009年6月），頁29-38。如學者所留意，譜牒之撰寫，其中含有使觀者省思、整飭宗（家）族內部秩序的意義。參談家勝：〈徽州族譜所錄文獻的類型與價值〉，《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38卷第5期（2010年9月），頁554-558。

集依世系先後編次」²⁸欲呈現世系源流、傳衍脈絡，可謂以家譜性質視之。又言：「後之人有因讀詩若文而想見其園並想見其人者，以傳之不朽，其在此志也。」²⁹更試圖以此彰顯家族榮光。凡此，皆可說《揚州園林志》雖無家譜之名，但有家譜之實。

而有關家族事蹟、記憶的紀錄，具有「史」的質性，³⁰編輯過程往往涉及敘述模式與文本建構、記憶的重塑。如李仁淵留意明清族譜書寫的虛構問題，提示了「虛」／「實」交錯的文本質性，³¹持此觀點來看，有關家族的紀錄或記憶，往往因為追述者、書寫者本身的立場、企圖、動機，深刻影響家族如何「被追想」。而家族園林志透過大量文學文本編構記憶，牽涉多元的敘述心態、模式，有待文學視角的申說、詮解、指識。

鄭氏家族屢次重修休園、纂輯相關園林文獻，重梳世系、標舉重要成員事蹟，可見其所欲對內創造記憶、凝聚情感。³²從家族歷史來看，鄭氏從歙縣遷揚後，由農、商賈而士人，特別在元勳、俠如兩人身上，體現士大夫特質與價值追求。明清之際，鄭俠如拒仕退隱，其子為光參與清代科考，位至御史，當中具有家族世代形象與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又，鄭氏自俠如後，後代子嗣頻頻面臨家園（產）被侵凌的恐懼，對「復家」一事充滿焦慮。故《揚州休園志》的編輯涉及複雜的家族形象、存續等課題。當一系列的家族記憶，被凝縮在《揚州休園志》當中，背後的編寫意志、心念、企圖，不同書寫者觀視的焦點與書寫實踐的動態過程，如何通過文學文本建構出一部具有特定指向和目標的空間家族史？值得留意。

此外，《揚州休園志》以「揚州」為名，顯見編輯者留意家族／園林／地域的關聯性。學者已然留意特定文士家園和位處地方、鄉邦交涉互動綜匯而成的社

²⁸ 〔清〕鄭慶估：〈凡例〉，《揚州休園志》，頁 1b-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14-15。

²⁹ 同前註，〈自序〉，頁 2a，頁 7。

³⁰ 梁啟超言：「族譜家譜，一族一家之史也」。參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384-396。

³¹ 李仁淵提到具有一定的敘事結構，如為了凸顯自身和中原文化核心的連結。見氏著：〈從史料到文本——族譜與明清地方社會研究〉，《中國史學》第 25 卷（2015 年 10 月），頁 85-97。

³² 如馮爾康論清人「家譜猶國史」之說，強調修譜如治史，目的要隱惡揚善、治國齊家、維繫人倫共性、必須「鑒治亂，示懲勸」，有著強烈的教化、倫理目的。氏著：《清代宗族史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349-362。

會文化現象。³³從空間來說，園林立基於特定地理、歷史位置，往往和外部社會、地方或地域產生連結。譬如園林在相地擇址、設計擘畫的過程，通過「借景」呈現自然地理、人文景觀相生互動的有機融合。而園林的建造、觀覽以及居處者的心態與意志，也充滿地方感，常與一地社會風氣、文化習俗相互牽引。因此以園林空間為骨幹的家族書寫，隱含家族特徵背後社會網絡的作用力，亦呈現園林和地方記憶的交涉、對話。³⁴

在清初的文學現象中，「記憶」作為情感認同、歷史表述的中介，是一被關注的主題，³⁵《揚州休園志》面對家族歷史所展開的追想與文字建構工程，是士人在時代中的言說、生存形式。從文本製作的角度而言，後人記園的心念與其記憶焦點何在？家族的形象如何被呈現？內容與意義為何？與時代的關係又是什麼？本文希望思索編輯者如何經由各類文本拼貼、組合，再現、表述一座園林和一家一姓的人地意義、典範，並以此理解明清地方士族以園林追想家族的記憶建構行動。

針對上述問題，以下先論《揚州休園志》中的鄭氏家族與園林的歷史記憶，說明鄭氏「家風」的特徵與內涵。次論園志書寫建構的先祖形象與嘗試彰顯的家族倫理價值及其意義。最後思索園林之於揚州地方的意義。期待揭示鄭氏家族如何以園林作為記憶中介，並與當時士大夫傳統價值、地域文化進行連結，展現其生命關懷。

³³ 參羅時進：〈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與問題視閥〉，《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5-6。

³⁴ 過往對於休園與揚州地方的觀察，主要立基於休園作為文會雅集基地的重要性。如：王穎：〈「廢興惟視詩書力」：論休園的文學空間意義〉，《安徽大學建築學報》第26卷第5期（2018年10月），頁94-99。如從文獻編輯的角度來看，研究明清宗譜編纂和祭祖儀式的特徵，目的是為了直接建立某種地方化的宗族團體來鞏固他們在基層社會中的地位，特別是對於特定祖先的強調。如馮爾康提到修譜是「尊崇敬宗收族」倫理觀念以及進行宗族建設的手段，參氏著：《清代宗族史論》，頁377-380。周啟榮探討明清時期「始遷祖」現象時，也提出和馮氏類似觀察，參氏著：《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以倫理道德、儒學經典和宗教為切入點的考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80。

³⁵ 如清初年的「記憶文學」強調以前朝舊物為觸媒，成為文士自我表述的重要文學形式。見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頁193-202。

二、園林與家風倫理的連結

有別於一般私家園林志直接以家園為名，且集中在單一世代切面的紀錄，《揚州休園志》取家族立基的揚州為題，以「志」為名，紀錄園成以來五世的家族發展脈絡、歷代人物傳記、並有園林與家祠圖像，可謂一部帶有地方色彩的家族史。下文將綜合梳理園志呈現的整體家族歷史記憶，說明園林空間與家族倫理價值的人／地連結，進而探討鄭氏的「家風」特質，同時說明家族對於士大夫價值的追尋、認同。

（一）以「園」存／顯「家聲」

從文本型態、內容來觀，《揚州休園志》文集依世系先後編次，將「記」列為卷一，收錄以園林空間為主題的園記、園賦，意欲通過具體的園林發展歷程敘說家族史。鄭氏遠祖居貞、道同兄弟，因明初靖難罹禍，從此戒子孫讀書，世代以農耕為業。從鄭景濂開始，棄農從商，並由歙縣入籍揚州，以鹽莢起家。三傳至孫輩有元嗣、元勛、元化、俠如四人。其中，鄭俠如與鄭元勛兩人先後登第，開啟鄭氏一族的名聲。鄭氏成員在文藝、文化層面亦卓有成就。如李光地（1642-1718）云：「蓋鄭之先，自新安徙維揚，一時羣從，科名接武，皆以詞章意氣傾海內。自前明時，其園林甲第已甲江左。」³⁶鄭元勛修築的影園是地方社集的重要據點。休園最晚建成，亦不遑多讓，宋和（?-?）〈三修休園記〉提到：「鄭氏世為文盟主，凡名流之著者，莫不來集於斯園。」³⁷明清易代之際，江左遭兵燹，揚州尤其嚴重慘烈。元勛死於高傑兵亂，園林頓失家長，故「影園之名最著，最先毀」、³⁸「彫牆畫閣一刻廢為荒墟」。³⁹「而五畝之宅二畝之間、王氏園

³⁶ [清]李光地：〈三修休園記〉，見鄭慶佑編纂：《揚州休園志》，頁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2。

³⁷ [清]宋和：〈三修休園記〉，見鄭慶佑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頁1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71。

³⁸ [清]張雲章：〈三修休園記〉，見鄭慶佑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1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6。

³⁹ [清]許承家：〈重葺休園記〉，[清]鄭慶佑：《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7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8。

次第俱廢，惟嘉樹園尚在，然亦頹敗不可收拾」⁴⁰休園與俠如一支，可謂揚州鄭氏入清後碩果僅存之代表，也是鄭慶怙「以園存族脈」的背景基礎。

相較三位兄長，俠如年幼，休園晚成。鄭俠如購買王氏、朱氏故地，朱氏舊址本為宋代名園，俠如相地起造，疊石理水、構列景觀：延宋人舊名，設有「雲山閣」，其他再建「語石堂」、「空翠山亭」、「漱芳軒」、「一拂草亭」、「墨池」、「樵水」、「寒碧」。⁴¹休園傳至為光時，俠如尚健在。而為光早逝，且長年任官在外，故推測休園景觀、規模應大抵維持俠如最初所創制。為光之子懋嘉年幼孤弱，休園幾為有力者所奪。但懋嘉主持重修時，在前人創園基礎上，再行擴增諸景，⁴²傳至鄭慶怙編《揚州休園志》時，共可見三十景。⁴³

自俠如創園後，共計五代，歷經三次重修未曾易姓，可謂揚州鄭氏一脈中獨秀特出者。對於鄭俠如的後代來說，休園是重振家聲與恢復家族記憶的重要核心，園林的存續狀態乃與「家聲」緊密關聯。故鄭家後人一方面通過實體的修葺，一方面也留意相關文字紀錄的承傳。

上述鄭氏後人對自家園林的維護、締構行動，展現明清士人對家庭倫理價值的實踐。明人文震亨（1585-1645）紀錄大臣王鏊（1450-1524）怡老園時曾提及：

園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以文章著，不若以子孫著也；以子孫之貴顯著，不若以子孫之忠孝著也。銅池、金谷、絲障、錢埒，如梁、竇、崇、愷，轉盼銷沈者，不足道已。即所謂平泉、綠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始未嘗不挾其高名，護及草木，而及身以後，漸辱於樵夫牧豎之手，

⁴⁰ 同前註。

⁴¹ 〔清〕許承家：〈重葺休園記〉，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頁7b-8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8。

⁴² 「三峰草堂」、「金鵝書屋」、「不波航」、「玉照亭」、「九英書塢」、「琴嘯」、「枕流」、「得月」諸臺榭，又擴園林後空地，名「逸圃」。同前註，卷1〈記〉，頁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0。

⁴³ 根據園志〈列景〉紀錄，共有：「空翠山亭」、「蕊樓」、「挹翠山房」、「琴嘯」、「金鵝書屋」、「三峯草堂」、「語石」、「樵水」、「墨池」、「湛華」、「衡書軒」、「含清別墅」、「定舫」、「來鶴堂」、「九英書閣」、「古香齋」、「逸圃」、「得月居」、「雲徑繞花源」、「玉照亭」、「不波航」、「枕流」、「城市山林」、「園隱」、「浮青」、「止心樓」、「耽佳」、「碧廣」、「植槐書屋」、「含英閣」。〔清〕鄭慶怙：《揚州休園志》，卷首〈列景〉，頁1a-7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9-41。

荒煙斷址，遺丘故館，不可彷彿。始不得不托於輞川之唱和，洛陽之記述，謂即代紀遼遠，水淺塵飛，而文章之流於天地間者，千古如新。⁴⁴

震亨以園林為觀看面向，反思園林在時間中的存續現象與本質義，園林實體本難久存，文字傳述提供了對治園林毀圯命運的可能之道，而園林若得具有倫理美範之後人持守，則是最理想的「不朽」狀態。

與文氏的反思相呼應，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即特別回應「園林」／「傳家」的課題。《揚州休園志》文本內容的編排結構關係，卷首在鄭玉珩倩王漢藻所繪製之休園全覽圖之後，⁴⁵續以「家祠圖」，再通過「列景」紀錄園內景觀的歷史沿革、名士題額，並繫以先人詩作，嘗試以圖繪、文字布列的雙線方式介紹家園大觀。鄭慶怙自言：「是集畧倣志書之體，繪圖列景於卷首，園圖之外，復繪祠圖，以見園因祠重，非徒為遊玩而設也」⁴⁶強調「園」之為中介，而「家祠」亦為並列焦點。鄭慶怙《揚州休園志·凡例》提及：「列景祇就從前所有，後經改易如寒碧、漱芳軒、雲山閣、一拂草亭諸額，槩不列入。」⁴⁷在空間紀錄的選擇上，強調崇敬先人創制之舊觀，後之改易者並不列入。卷二至卷六為全書骨幹，分收壽序、序跋、傳、誄、墓誌、祭文、行狀，環繞鄭氏祖輩的行事、人物記憶展開。至於有關園林的遊賞題詠，集中在卷七、卷八。從強調家祠圖與先祖人物紀錄的表意形式來看，《揚州休園志》的編輯，乃是環繞對先人的追懷與敬意而展開。鄭慶怙（？-？）更進一步強調：

若不急為保護，則先人艱業苦心與名人遊覽盛事將並就消歇，不免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者。用敢敬承先人之意，修舉廢墜，一還池臺舊觀，於是復廣加搜羅凡先人懿行，外而文章諫草，內而孝友節烈及文字筆墨有關係休園事實者，都哀錄成帙，釐為八卷，付諸剞氏，名曰《揚州休園志》。噫！亭之建不過為耳目愉玩之助，其盛衰興廢不常者多矣！

⁴⁴ [明]文震亨：〈王文恪公怡老園記〉，《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62。

⁴⁵ [清]鄭來：〈書休園圖後〉，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85。

⁴⁶ [清]鄭慶怙：《揚州休園志·凡例》，[清]鄭慶怙：《揚州休園志》，頁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3。

⁴⁷ 同前註，頁1a-1b，頁13-14。

斯園也，經始於孝思、守成於德業，自子而孫延及於今，歷有五世，花木竹石之外，別有清芬，有久而勿替者也。後之人有因讀詩若文而想見其園，並想見其人以傳之不朽，其在此志也夫！⁴⁸

鄭慶怙意識到園林物質性的存續樣貌，反映家族發展狀態。園林縱使經歷重修，也難免隨著時間性而被剝蝕、減損，此即「不常」。相對於此，家族先人的良美範式如何經由後代完整保存傳遞，是為「常」。故鄭慶怙興起編選園志之念，期待通過文字不朽，一面呈顯園林的「不常」記憶，同時又集結傳述、凝合家族人文圖像之「常」，能在園林遭逢「盛衰興廢」的必然時間性命運時，形成一股抵禦之力。

此一「常」／「不常」對舉的思維模式，也為後人放在園林盛必有衰的生命特質中進行解讀、推衍。如方象瑛（1642-1685）言：「如以耳目之玩、丹雘增飾為不墜先澤，猶其小焉者也。」⁴⁹已留意到園林實體、遊樂功能的整復工作屬於表象，並非鄭氏後人心意，吳綺（1619-1694）提到：「休園者，鄭水部俟菴年伯所營之菟裘也。中為他姓所據，懋嘉復而新之，先業得以弗墜，蓋仁孝之意存焉。」⁵⁰又言：「盛必有衰，美為難繼……懋嘉心傷留硯，意在肯堂。見曲水之烟雲，咸為念祖。愛平泉之樹石，不以與人。……遊觀實有當於仁孝矣！」⁵¹指出興修園林為鄭氏後人「仁孝」精神之實踐，可傳久遠。諸多來遊文士，也基於上述心態，將遊覽觸發之情思，和對鄭氏後人尊祖敬宗的禮讚相互連結。如吳瑛（？-？）〈書三修休園記後〉：「茲園之歷一脩、再脩，以至於三也，特其仁孝之一端耳。……《詩》有之曰：『繩其祖武，於萬斯年。誠能繩先人之世德。將斯園也，百修未艾。』」⁵²認為重修行動是承傳先人世德的具象表現。其他如陳瑄（1645-？）

⁴⁸ [清]鄭慶怙：《揚州休園志·自序》，[清]鄭慶怙：《揚州休園志》，頁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7。

⁴⁹ [清]方象瑛：〈重葺休園記〉，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47。

⁵⁰ [清]吳綺：〈重葺休園記〉，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5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3。

⁵¹ [清]吳綺：〈重葺休園記〉，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6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5。

⁵² [清]吳瑛：〈書三修休園記後〉，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頁20a，收入鄭曉霞、

提到：「翩翩冠蓋古城東，選勝園林到處同。須信貽謀傳世德，方能肯構繼家風。樓臺秀起聲歌外，泉石思深仁孝中」，⁵³鄧漢儀（1617-1689）〈休園讌集四首〉：「為詩追祖德，暫擬閉柴關」，⁵⁴呂謙恒（1653-1728）〈三葺休園〉：「知君不為烟霞癖，念祖常懷奕世恩。」⁵⁵在來遊賓客的筆下，園林賞觀活動或詩文唱詠，皆被轉化為對祖輩的致意。至於史樂泮（?-?）〈休園賦〉所詠：「范喬乃捧祖之遺硯，嗣厥家聲，陸機誦先人之清芬，歸休花宅。」⁵⁶以及方象璜（1625-1692）所言：「亭臺不改前人志，簪笏還承奕葉芳。」⁵⁷在他姓遊人眼中，鄭氏一族與休園重構的人地關係，即有了「恢復祖德」、「承前人志」的記憶指向。在象徵家族發展狀態的物質性基礎上，加上相關文字呈顯「家風」、「家族形象」，凸顯尊祖敬宗之「常」，試圖跳脫園林存續「不常」與「盛必有衰」之困限。

（二）從士商兼行到讀書傳家：鄭氏家風的轉向與發揚

《揚州休園志》的書寫行動，既以「復（存）家揚聲」為主，追溯家族根源乃是重要呈顯的文本焦點。園志收錄的篇目之中，諸多作品不約而同提及鄭氏家族的源流與特質，從而建構出鄭氏一族的社會形象。這些篇目呈現其家族發展的進程：祖訓誡→居歛務農→遷揚後商莢（鹽業）起家→儒商兼棲→經書傳家。

明初，遠祖鄭道同、鄭居貞因參與靖難之變，罹禍遭害。面對政治的陰霾情緒就此滲入祖宗「戒讀書」之家訓。⁵⁸至鄭景濂一代，遷居揚州，景濂善經商，「公

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83。

⁵³ [清]陳瑄：〈重葺休園〉，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3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34。

⁵⁴ [清]鄧漢儀：〈休園讌集四首〉，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3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36。

⁵⁵ [清]呂謙恒：〈三葺休園〉，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3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93。

⁵⁶ [清]史樂泮：〈休園賦〉，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賦〉，頁15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76。

⁵⁷ [清]方象璜：〈重葺休園二首〉，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5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40。

⁵⁸ [清]馮元飈：〈鄭母張太夫人墓表〉，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5〈墓誌〉，頁8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353。

雅慕儒而為賈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贏金與腹笥孰多？』」⁵⁹即言景濂雖為商賈，然心嚮儒業，通過具體教育，將未遂心願付諸實踐：「時時訪名宿為家塾師」、「率其子弟致力於文學，曉窗夜燭，漸多摩研編削之才矣。」⁶⁰有意培養家中讀書種子。其後，景濂子鄭之彥頗能繼承父志，起始跟隨叔父從習鹽業，叔父「令歸習句讀，漸學帖括言，手錄古今文成秩。」⁶¹可見鼓勵、敦促後輩學習舉業為鄭氏遷揚後的家族成員共識。因此，之彥亦明確以仕途為人生標的，傳文言其「公兼事儒，而主其世業。」⁶²雖兩次應試不第，卻更加確立家族後輩的人生追尋。陳繼儒（1558-1639）〈鄭母張太君七十壽序〉曾提及此一家業心念的轉折：

自潔潭公來寓揚，始修其儒術，見重于大司馬汪伯玉，始娶紹川張公女，實惟太君。然以儒業起家。而先世挾鹽策、稱江淮巨商，故公雖未售，而以其學授超宗兄弟，先後登賢書。其長公長吉、季公贊可，入國學，猶視煮海。而超宗、士介，則業儒，以故超宗之豪，人謂其有父風。⁶³

鄭之彥四子中，長吉、贊可雖入國學，但猶承繼家族事業，元勳、俠如即開啟仕途，四子同學而異業，呈現鄭氏家族由從商、儒商兼棲且逐漸朝向士人志業發展的走向。從元勳、俠如登第後，鄭氏以士名為時人所稱道。明清易代後，俠如退歸築園，不仕新朝，其子為光以下，世代皆以參與新朝科考為志業，且「本支已百餘人，多以科名起家致身通顯」。⁶⁴在家族存續的過程中，這些不同世代家族成

⁵⁹ [明]陳繼儒：〈潔潭鄭翁傳〉，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4〈傳〉，頁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73。

⁶⁰ [清]張玉書：〈誥贈榮祿大夫潔潭鄭太公暨一品夫人元配汪太夫人合葬墓誌銘〉，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5〈墓誌〉，頁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341、343。

⁶¹ [明]陳繼儒：〈太學東里鄭公傳〉，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4〈傳〉，頁5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79。

⁶² [明]艾南英：〈太學東里鄭公行狀〉，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6〈行狀〉，頁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427。

⁶³ [明]陳繼儒：〈鄭母張太君七十壽序〉，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5a-5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00-101。

⁶⁴ [清]張玉書：〈誥贈榮祿大夫潔潭鄭太公暨一品夫人元配汪太夫人合葬墓誌銘〉，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5〈墓誌〉，頁3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

員的身份認同、生命目標的顯像，雖有家族發展過程中形塑出的共同目標，亦有殊異變化，故由《揚州休園志》開展的鄭氏「家風」，實有不同世代階段的轉折意義，也呈現鄭氏獲致「士」身份地位的不易與堅持。

在過往的研究中，有關揚州新安鹽商／儒身份世代轉換的討論，或謂確保家族利益延續，⁶⁵或言出於好名，⁶⁶但《揚州休園志》的書寫，雖同樣出於追求家族名聲，卻特別淡化上述「名／利」因素，意欲凸顯兩項重點：一是強調先祖雖從商是出於現實生存需要，並非逐利。雖為商賈，然具備士人傳統價值美範，且始終傾心於儒業。其次則說明家族由商賈大戶走向詩書門第，乃與先人美範所形塑的家風相互連結。大抵而言，園志掩抑鄭氏為「商」行徑，展現服膺「士」身份的價值追求。

針對遷揚後的景濂、之彥二祖，《揚州休園志》強調其非普通商販，而具備傳統士人認可的道德價值、行事作風。如艾南英（1583-1646）〈鄭年伯張太君六十壽序〉即言鄭之彥「終身無二色，家無歌舞聲伎之奉。」⁶⁷凸顯行事樸實低調，意欲與一般商人社群的豪奢形象做出區隔。陳繼儒〈潔潭鄭翁傳〉記載：「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為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復。」、「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如呼吸不待頃而至」、「至其尋常棄責析券、排難解紛，扶喪施棺、濟人利物之事種種盛德，又不可數舉矣。」⁶⁸突出景濂以商賈身份力行傳統士大夫施惠鄉里的行事美德。且時人稱述景濂持家時，鄭氏一族「同居五世，

第 25 冊，頁 344。

⁶⁵ 如藤井宏指出，在新安商人的觀念中，仍以商賈為首要，儒業是其次。因此鹽商透過援助宗族入仕、鼓勵子弟應試、捐納得官、結識官員親友，嘗試與國家權力結合，形成壯大家族勢力的發展模式。見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研究〉，收入《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232-234。安東籬（Antonia Finnane）著，李霞等譯：《說揚州 1550-1850 年的一座中國城市》（北京：北京聯合出版，2022 年），頁 84-91。

⁶⁶ 何炳棣則揭示明清鹽商積極培育後代成為士大夫，進行社會轉型的社會文化行為。見氏著，巫仁恕譯：〈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59-76。

⁶⁷ 〔明〕艾南英：〈鄭年伯張太君六十壽序〉，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2〈壽序〉，頁 3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96。

⁶⁸ 〔明〕陳繼儒：〈潔潭鄭翁傳〉，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4〈傳〉，頁 3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75。

食指近千人，孝友敦睦，人咸指為義門後。」⁶⁹將特定祖輩的「義行」視為重要的門楣特色。陳繼儒〈太學東里鄭公傳〉敘述之彥勤敏好義，身為家督，能使五世共炊；面對奸小攻訐已逝叔父，挺身捍衛「群賈儼公之才」，且「有大疑大慮，不質之有司，而質之公」又熱心為他族叔姪爭產解紛，「吏聞而歎之曰：此儒中魯連先生也。虛左相延，多有所咨決」、「公指陳利國通商之事，鑿鑿明辨，聽者屬耳洞心，頒行惟恐後。」⁷⁰展現之彥才幹識見，雖無功名在身，但已是地方具公信力的有德長者，所謂「儒中之魯連先生」更彰顯其行事之「義」，為地方表率。

值得注意的是，《揚州休園志》所錄景濂、之彥兩祖的相關敘述中，最後皆以子孫登第的描寫收結。如提及之彥晚年病重，聽聞姪兒元禧中舉，言「天祚吾鄭氏厚矣！厚矣！吾雖病不瘳，何憾乎？越三日談笑沐浴而逝」⁷¹通過對景濂、之彥生命行跡的敘述，《揚州休園志》一方面說明世代志業轉化過程，同時亦標定、揚舉了鄭氏一族「孝義」的內涵，形成「有德者」必「登仕途」的話語論述。

在景濂、之彥有心栽培下，鄭氏一門逐漸完成世代志業的轉化。不過，對於鄭氏家族而言，讀書登第除是對士人價值的認同之外，亦有現實需求。由於家族男性早逝，遷揚後由祖輩積累的家業成果，自然容易成為龐大家族中他人所覬覦的目標，如言鄭懋嘉：「懋嘉孤幼，幾為強有力所奪。懋嘉心傷之，英年攻苦，焚膏繼晷一出而捷北闕。始復前人之舊，而增修之。」⁷²而「仕途」是後代振復家勢的途徑。故俠如之後的為光、懋嘉、玉珩先後投入新朝科舉、步入仕途，力使家族傳承不輟。方象瑛言：「懋嘉既登賢書，文名卓絕，江左槐廳柏府，直君家故物耳，何足為懋嘉重繼？自今益務栽培，使堂構之貽子孫，世世守之，永于勿替。」⁷³傳達鄭氏後人以讀書守成、興復家族作為「傳承勿替」的重要基石。

此外，通過《揚州休園志》可知，鄭氏既有詩書積累的成果，也展現士人稟賦才幹的花爛映發。如方象璜（1625-1692）〈重葺休園〉追想：「水部詩才凌北

⁶⁹ 同前註，頁 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73。

⁷⁰ 〔明〕陳繼儒：〈太學東里鄭公傳〉，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4〈傳〉，頁 6a-6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81-282。

⁷¹ 同前註，頁 7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83。

⁷² 〔清〕方象瑛〈重葺休園記〉，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1〈記〉，頁 2a-2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47-48。

⁷³ 同前註，頁 3b-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0-51。

斗，端公諫草滿南牀。」⁷⁴強調鄭俠如父子的文藝才能，並凸顯鄭為光入仕後的戮力用心。又如陳琮：「紫薇月帶仙郎韻，翠竹霜高御史風。閉戶晴窗開萬卷，康成家學幾人同」，⁷⁵王民：「彤廷諫草遵先訓，永夜文心續大家。」⁷⁶在先人儒業轉向的感召下，從俠如、為光、熙績皆以文心與政聲勉勵相繼。無論是醉心文史、情意高尚的優雅高士，或是力學讀書的國之棟樑、深思敏事的殷勤博雅學者，鄭氏後人切身實踐的儒業成果，遂成為休園獨特且引人注目的風景，更是鮮明的家族標誌。通過《揚州休園志》的纂輯，鄭氏一族嘗試讓讀書家風在浮靡射利的繁華揚州氛圍中，展現出獨特典範。

三、休園空間意義的詮釋與轉化

上述園志譜寫的「歷史」與「家風」，涉及家族整體社會身份特質的建構、標定，凸顯鄭氏一門與士大夫傳統價值的關聯性。相對於此，《揚州休園志》也嘗試通過更細部、具體的人物書寫，進一步落實「家風」的價值和寄託。

團昇（?-?）有言：「予觀揚州古繁華地，當明季承平日久，故家大族多占地為園亭，以自娛樂。方其盛時，高臺曲沼，酒座歌琴，意氣雄豪，豈不謂子孫萬世之業？歲月不淹，風流易盡，一轉瞬不獨富商巨室僅恃片時氣焰相誇詡者，其人其地本不足持久。即鄭氏水部同懷諸兄所謂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影園、嘉樹別業，何嘗不著為故事、傳美藝林，不數十年亦復聲漸影滅，莫可蹤跡。則甚矣，創業之難而傳世久近之不可以預，必也。」⁷⁷面對興衰無常、轉瞬易變，究竟什麼才是家園「本足持久」的呢？團昇的疑惑，實為明清文人觀園時常興發的情思。如無錫秦氏寄暢園起於晚明，姜宸英（1628-1699）提及鄰近鄒氏愚公谷「勝絕吳中」但「今亦將廢為荒墟」又言：「惟搢紳有道之士能持身正，創業以世其家，而子孫之賢者，能修德以光大前烈，此百世不忘者也。今以一園之有無為秦

⁷⁴ [清]方象璜：〈重葺休園二首〉，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5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40。

⁷⁵ [清]陳琮：〈重葺休園〉，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3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35。

⁷⁶ [清]陳琮：〈休園讌集〉，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21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72。

⁷⁷ [清]團昇：《揚州休園志·序》，見鄭慶怙編纂：《揚州休園志》，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2。

氏重輕者，固不足以知此。而因此知秦之世有令德，將徘徊瞻眺之餘，必也感慕而興起者。」⁷⁸有道正身者肇基持守，而為後代感慕、惕勵。因此，特定家族人物典範記憶的塑造，當是「家風」得以揚舉、園林家業能夠世傳的關鍵。典範人物與園林共同呈顯的人地關係，具有何種意義？以下將通過《揚州休園志》記載的人物圖像，說明編者如何通過先祖事蹟，詮說其生命情志，並從中展現不同意義層次的家族圖像。

在《揚州休園志》追溯祖德、標舉家風的過程中，特定家族人物的紀錄是其書寫焦點。其中，造園始祖鄭俠如賦予人地遇合的奠基意義，以「休」命名，除暗藏個人心曲外，經由其他文士以遊觀經驗、投贈文字的說解，再加上不同世代子孫在重修園林過程中對於人物形象的重新賦義、詮說，又展現多層豐富的人地意義。

（一）鄭俠如的園主心意

有關休園空間內涵與「休」的命意，或可從俠如生命行事窺知一二。俠如曾於崇禎十二年（1639）貢舉應詔，然可能見時局紊亂，且「生平恬靜寡欲，不屑屑與世競。」⁷⁹、「博學好書，不與世俯仰。」⁸⁰故辭歸不仕。後因甲申年間，元勳遭高傑亂兵害死，俠如奔赴金陵，以昭兄冤，受在朝推薦，授任工部司務。俠如任上曾諫止開採寧國煤山，為民稱頌。乙酉後，因左良玉興兵號召清君側，討伐馬、阮，南京戒嚴，俠如受命防禦鐘阜，協助城防、營繕、工事修造，有江表長城之譽，⁸¹俠如「居數月，金陵又變，大臣競鑽營，戀戀不能去。公獨辭，主者不可。固請，泣血，乃許。」⁸²南京陷落後，身為前朝命官，俠如「乞歸骸骨」拒絕仕清。當時與鄭俠如共防南京城的鍾鼎（？-？）記載一段對話：

⁷⁸ [清]姜宸英：〈惠山秦園記〉，[清]秦國璋：《寄暢園志》，卷6〈藝文下〉，頁174。

⁷⁹ [清]許之漸：〈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見鄭慶估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17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23。

⁸⁰ [清]龔鼎孳：〈鄭水部六十壽序〉，見鄭慶估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19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27。

⁸¹ [清]鍾鼎：〈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見鄭慶估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1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11。

⁸² [清]王猷定：〈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見鄭慶估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9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07。

中堂洪公來，詢事考言，甚重之，欲刻為大用，而公乞歸甚力。洪哂之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子所以去？」督師洪公知公才，強留之，不可。於是公素負經濟，未盡展布，抑鬱里居，惟課子讀書，日夕不少休。子為光遂以己亥成進士，後官御史。⁸³

面對洪承疇的勸降，俠如堅辭，幸未被為難，而能全身而退。鍾鼎推測俠如「素負經濟，未盡展布，抑鬱里居」，又提及為光於新朝應科考，並步至高位，強調俠如教子有成，可作為其當年志向襟抱未償的對應。如是敘述，純粹將鄭俠如易代抉擇行動意義，解釋為士大夫希冀展才、有用於世的心念期許。至於對俠如面臨政權更迭的掙扎、以園居作為身份認同表述的心意，則輕筆帶過。或因鍾鼎自身降清且出仕，以此詮說鄭俠如的心意，實有自諱之嫌。但這也說明於此一詭譎的政治情境中，俠如當時的判斷，既不願與權力妥協，亦希求保全家族，毋寧是極為艱難複雜的抉擇。

俠如雖未明說自我易代時的抉擇緣由，不過他所留下的《休園詩餘》取名於園，可從中窺探主人心意。在〈霜天曉角·休園自警〉：

角巾歸里。卜築瓊花底。取蔽風雨而已，泰山松、豫章梓。姚黃魏紫，遶徑皆桃李。若問主人誰氏，一字師四休子。知足知止，萬事循天理。母作福先禍始，不伎求誰譽毀，枕流洗耳。左右皆圖史。開徑但延三益，君子交，淡如水。（自注：孫昉四休居士曰：簞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兩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⁸⁴

主人疏曠自足，以簡約樸素的物質狀態安於園居生活，不求毀譽、但循天理。取孫昉「四休」為喻，有意凸顯自我清心寡慾、恬然適足的快樂。俠如既以「自警」為題，可視作自身修持的惕勵語，但結合其時代行跡，或許也有另一層深意待解。試觀〈卜算子·梅花〉：

⁸³ [清]鍾鼎：〈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見鄭慶估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11a-11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11-112。

⁸⁴ [清]鄭俠如：〈霜天曉角·休園自警〉，《休園詩餘》，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555。

冰雪淨聰明，馨香盈懷袖。一片寒光接素霞，花比人還瘦。孤月浪中翻，薄雲岩際宿，晚節猶存鐵石心，常共松筠茂。⁸⁵

上片詠梅，由物色之「馨香」、「寒光」引譬已志。下片喻旨更明，主人以月明心，孤月浪中翻，象徵易代之際世道人心如浪湧滔滔，亂無定向、勢更巔危，同行友朋或殉死或出降，己之退歸，如月之孤索，更暗指自身猶存故「明」之意。晚節鐵石心，則是歷經生死抉擇後的自我註解，期與松筠常青，展現晦明風雨的持守姿態。又〈午日休園再疊前韻〉：「積雨時晴，天中日、荊灣濤漲。聞競渡、魚龍鬪技。錦帆無恙。弔屈同哀湘水畔，擬陶高卧羲皇上。」⁸⁶主人聞揚州茱萸灣競渡聲響，先追想屈子為國身死，再言己身園居如淵明高臥，即是不向他姓新朝妥協媚合的貞白自持。再觀其〈山居〉：「餐石髓，煮潺湲，逍遙不離禪。風臺月觀悄無言，為農且用天。」⁸⁷回歸農事，表面的逍遙、無言，是生命有意和現實保持退離的姿態。因此「聽天」並非隨波逐流，而是一種明白現實處境後的調節與修正。俠如本非熱衷仕事，之所以為官，極大部分原因是為其兄元勳冤死伸張正義，此一是非判準乃奠定在人倫道義基礎之上，遠則為國，近則是退歸「保家」，在其認可的傳統士人的襟懷中，「家」是最終持守的道德防線。⁸⁸然而，如是抉擇，不免無奈，且未必能時刻安居。〈孤悶〉即流洩此意：

清氣到蓮塘，荇藻皆香。雲山樓外鬱蒼蒼，忽地風來花落也，驚散鴛鴦。雨過墨池涼，酒盞詩囊。一回自適一回傷。中年諸事有，髮短心長。⁸⁹

⁸⁵ 同前註，〈卜筮子·梅花〉，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頁 555。

⁸⁶ 同前註，〈滿江紅·午日休園再疊前韻〉，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頁 576。

⁸⁷ 同前註，〈醉桃源·山居〉，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頁 555。

⁸⁸ 如學者指出，清初漢族士人的出處的安排，非純粹個人價值取捨，而是有家族利益的考量。見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04 年 12 月），頁 387-419。陳永明認為明臣降清的理由複雜，動機難一概而論，參見氏著：〈降清名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97-228。以利益為導向的決定固然符合人情，但俠如與鄭氏家族的例子，應同時具備家族存續、個人性格和道德判準的多重考量。

⁸⁹ 〔清〕鄭俠如：〈浪淘沙·孤悶〉，《休園詩餘》，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頁 557。

園林縱使提供主人庇護和暫時性的隔絕，提供了「自適」，但「驚」、「傷」憂感仍蟄伏伺出。隨年歲遞增，思緒或因當年艱難的家／國取捨回憶，仍困結於無解、無名的生命課題之中。因此，肉身凋殘，但心事恆留，且在主人血氣精神衰頹時，滋長攀附，無聲無息、未曾停歇。易代後的倖存者，是真傷心人。

對於鄭俠如拒降、退歸築園的心理和行動，在不同文士的書寫中有著不同的面相。吳綺（1619-1694）提到：「休園者，余年伯鄭士介先生所營之菟裘也。先生雅慕仲連、尚懷元亮。」⁹⁰仲連者，為人排難解紛，重義輕利，以「不帝秦」著稱。此之秦者，或有隱指「清」之意。淵明避守，不與當朝妥協，且能保身全志。故明遺老杜濬（1611-1687）作〈俟菴先生傳〉：「器識偉然，以忠孝名節自礪。」⁹¹強調俠如勇於擔責的士人特質，言其退歸乃是「以家國故，力以疾辭歸。」⁹²其中，「家國故」既可以是對於現實局勢的客觀敘述，以此解釋俠如因家國變故選擇退歸；但也不妨視俠如「為家國」而辭歸，暗藏以「逸」作「遺」的政治認同。又如杜濬曾提到「而公處己亥之後，愈恬愈淡，絕不問戶外事。」⁹³己亥即順治十六年（1659），一方面俠如子鄭為光順利登第，已然完成世代交棒的意志。同年也是鄭成功與張煌言謀劃渡江反攻，失敗後退守臺灣，復明再無望。雖無確切俠如與復明勢力交涉的證據，然亦未嘗不可視之為因外部局勢造成遺民心事的消隱。

同輩許之漸（1613-1701）〈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則從另一角度展開詮說：

自古一代之興，功臣名匠不乏，而所恃以定大策、匡大難，奠家國於磐石之固者，其人非必有馳驅、執掌之勞，披荊斬棘之烈也。非必蒙矢石、犯鋒鏑，出入戎陣之中者也。往往從容帷幄，置其身於若潛若見之間。出則慷慨激烈、趨朝陛恐後。而處則高蹈遠引，棄萬戶侯若敝屣。或耽神仙家言，或引其妻子日蒔花藝草以為樂。蓋自漢留侯、唐鄴侯以來，其風致往

⁹⁰ [清]吳綺〈重葺休園記〉，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5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3。

⁹¹ [清]杜濬：〈俟菴先生傳〉，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1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91。

⁹² 同前註，頁1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93。

⁹³ 同前註，頁1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94。

往不絕矣。……水部士介公，不馳逐於朝，不役役於野，而間與其夫人汪孺人灌小園自適，砥行折節，有古鹿車風。或曰公隱於官者也。或曰公以處為出者也。或又曰公棲泉石、學草木，殆托黃老之術而逃焉者也。而余曰：不然，以彼若潛若顯，所謂得留侯、鄴侯之遺意而用之者非耶？⁹⁴

相對上述文士關注俠如選擇退歸的「休」之意，許氏看重其在明祚危殆的危機時刻挺身而出的行事風範。「當是時，闖賊發難北都，士大夫讀書有幹濟者，咸思奮發有為，得一官自放效。于是公慷慨奉詔，不復讓此。與留侯之趨沛、鄴侯之奔赴行在，意豈異哉？」⁹⁵通過漢代留侯與唐代李泌（722-789）出處進退的實踐，認為俠如於明末選擇出仕，雖源於士人內在情志的感召，但也未忘卻政治權力冷酷多變的本質，故保有自我內在理性的清明冷靜。一旦初衷既遂，即選擇退歸以避其鋒。許氏的敘述與描繪一方面凸顯俠如具備承擔士大夫家國責任的形象，同時也呈現易代之際，士人面對「出／處」辯證的複雜心跡。如是詮釋，既認肯鄭俠如面對「出／處」的自主性、能動性，亦顧全了其築園行動的自我認同、道德價值。

由此來看，鄭俠如退歸築園，除了韜光養晦、維護家脈不斷，還具有不與當朝合作的遺民姿態。這些共行過易代的同輩友朋，從不同的觀看角度出發，嘗試賦予俠如與休園人地關係多元解釋，可謂知音，並突出傳統士人出處原則的園主意志。

（二）「休」的重新詮釋與其轉化

俠如以「休」名園所開創的人地意涵，雖在同輩文士與友朋中，能得一二知音，當其隱微心事歷經時變、家族世傳後，原初的園主心念在他人讀解中產生了意義層面的鬆動與根本轉化。俠如以後的晚輩文士，其對「休」的詮說，同樣環繞著俠如的築園行動，卻有不同焦點和關注面向，形成「世代對話」。

從外人視角來看，計東（1624-1675）與鄭為光同輩，根據俠如〈霜天曉角·休

⁹⁴ [清]許之漸：〈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16a-16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21-122。

⁹⁵ 同前註，卷2〈壽序〉，頁16a-16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24。

園自警》所引孫昉「四休」之語，詮解鄭俠如創園「休」之意：

同年鄭侍御尊公士介先生，筮仕冬曹，年未衰，即以恬退，辭職歸田里，卜築于宅之西名之曰「休園」。索記於東，或謂東曰：昔孫昉自稱「四休居士」，有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兩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之語。園之名蓋有取乎是？東聞而歎曰：「休」之字義有二：曰止，曰美。美莫大于知止。先生守正不回，急流勇退之意見於斯矣。雖然，猶有欲休之見者存也，飽即休，將不飽不休乎？暖即休，將不暖不休乎？過與老亦若是焉。若得休而後可休，不得則時當休而不休，甚且勞苦逐逐而不止，休之義當不盡是，東竊疑之。再讀先生《休園省錄》載蘇子瞻語曰：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思何時得至，忽然悟曰：即此間，有何不可止者，由是如脫鉤之魚，無不解脫。子瞻一休捷於孫昉四休多矣。先生既錄其言，則於休之義必更進是可傳也。因書此，爲之記。⁹⁶

計氏強調俠如「年未衰，即以恬退，辭職歸田」，以「恬退」的角度說明退歸築園的動機，並認為此舉符合蘇軾言「何不可止」、時時可休的境地。如是說法，也被其他文士認可，並加以擴大推衍，如李光地提到：「本朝定鼎，水部公守止足之分，未老懸車，爰有休園之葺」⁹⁷言俠如具有急流勇退的智慧，並從「獨善」的角度詮說其退守的抉擇。相較於同輩文士所描繪的俠如形象，上述後輩對於「休」的理解，顯然將俠如背負家國、政治認同的重大出處議題簡化，且抹去了俠如易代認同的脈絡與生命情境。

張雲章（1648-1726）〈三修休園記〉提到：

鄭氏自水部以「休」名園，所以自處者可之矣！所以戒子孫者可知矣。人之情至於富極貴，溢而猶不知止，至不檢束以干天地鬼神之怒，奈何其不

⁹⁶ [清]吳綺：〈休園記〉，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45-46。

⁹⁷ [清]李光地：〈三修休園記〉，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2。

及身而止也耶？休之為名，止息之義也。其所能止息者，知足之故也。知足則常留有餘，以貽其後之人，有持盈戒滿之心，是即《易》之謙道也。推水部之意，仕且不欲顯，而況其他乎？余嘗識比部君，猶謙謙不欲尚人，荊璞年甚少，藉衣冠之華胄，絕無紈袴帶履之習。與余遇於京師，欲然不足，而執禮甚恭，余以是知荊璞守其家法而傳之未有艾也！……以見其所以長保此園林臺沼、亭館之勝者，良有以也。⁹⁸

俠如以「休」應世、自處之道，在新時代文士的解讀中，關注「休」對於家族物質性、財產的象徵，被認為是單純自警的戒盈保身、全族之道，而「余以是知荊璞守其家法而傳之未有艾」甚至俠如的行跡，更成為了世代遵循的「家訓」標誌。在如是論述中，幾不見俠如身處「易代」的掙扎痕跡，而更看重以「休」作為訓誡後輩成員、傳家守身的道德意義。

對於鄭氏家族內部來說，伴隨易代喧擾、肅殺與詭譎的氛圍褪去，後代以「恢復先人」聲名重修園林，也通過自我的園居經驗，對俠如當年歸園心事做出解讀。俠如之孫鄭熙績重葺休園後，《含英閣詩草》留下不少園林題詠篇章，從中可察知休園空間意義的轉向。面對自我退離官場的心境，鄭熙績〈重葺休園集字得十五首〉小引有言：

壬戌暮春，余自南宮被放，初歸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爰藉休園稍加葺治，刪彼草間之榛蕪，平我胸中之壘塊。⁹⁹

熙績因屢試不第，希藉園居作為生命重心的轉向與調復，作為科名不遂的代償。熙績〈重葺休園有感〉（有序）：「休園者，先大父水部公著書習靜之地也。先大父解組歸田，即以杜門課先大人。及先大人成進士，讀書中祕，先大父專以著述自娛，故《邇言》、《省錄》諸詞集，皆以休園名。」¹⁰⁰則是從自我在新朝的仕途經歷為出發點，將祖父打造的休園定義為其個人生命追求獨善、習靜之所。

⁹⁸ 〔清〕張雲章：〈三修休園記〉，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2a-12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7-68。

⁹⁹ 〔清〕鄭熙績：〈重葺休園集字得十五首〉，《含英閣詩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清康熙含英閣刻本），卷5〈五言律〉，頁45。

¹⁰⁰ 同前註，〈重葺休園有感〉，卷6〈七言律〉，頁63。

〈休園落成下帷漫興〉先言對於自家園林重修新貌的期待：

荒園何幸又重新，花木爭妍值暮春。草閣清幽聲寂寂，泉流曲折響鄰鄰。
靈和風致懷張緒，谷口高踪鄭子真。閉戶誰云多歲月，分陰宜惜可書紳。¹⁰¹

以張緒的清新風雅，鄭子真的高隱自許，凸顯「閉戶」遠離世事擾動的居遊精神。熙績又作〈休園自題〉三首言：

宅後荒園，先人菟裘。歸田解組，杖履優遊。知足知止，不忤不求。高臺
眺遠，水閣盟鷗。池迎邗水，地近玉勾。園名自署，心逸日休。（之一）
愚公之谷，隱者之居。門屏褊客，架列藏書。心無榮辱，口絕毀譽。蒔松
種菊，聽鳥觀魚，山林經濟，城市樵漁。只宜詩酒，不稱簪裾。（之二）
蕭然小築，欲擬子真。依山結宇，傍水乘綸。岩邊對局，花下留賓。淵明
載酒，公瑾攜醇。琴邀叔夜，轄彷彿陳遵。雖非綠野，可遠紅塵。（之三）¹⁰²

相較杜濬等同輩友人認為俠如歸鄉應暗含不仕新朝的苦衷，其行跡雖「止」，然內心實未必「足」。熙績的詮釋則全然隱沒此段先祖心曲，逕以「隱者」稱俠如。詩中取古人典範自喻，雖觸及淵明、嵇康，卻著重其縱酒、操琴的形跡與逸樂樣貌而不涉政治認同，強調「心無榮辱，口絕毀譽。」主人既不被俗名所擾，也不願涉入人事糾葛，只願蒔松種菊、聽鳥觀魚，全然展現辟世的隱者姿態。

鄭熙績〈休園自題三首〉詩後錄有文友賞評：「疎疎落落，冷冷閒閒，不知是休園詩，是輞川畫。曾交懋老而遊休園者，味此神怡。未入休園而識懋老者，讀此神往。」¹⁰³在他人的觀視下，休園乃如王維輞川別業，展現居遊者的悠然自在，且有疏、落、冷、閒的獨立姿態。一如其〈夏日園居〉後文友評點：「高卧北窓，傲然羲皇上人境地。自足千古，却被『胸無僮擾，人在清涼』八字勘破，真乃見道之言。」¹⁰⁴說明熙績悠遊於自家境界，不涉人世擾動。可見在後人的經

¹⁰¹ 同前註，〈休園落成下帷漫興〉，卷6〈七言律〉，頁67。

¹⁰² 同前註，〈休園自題〉，卷2〈四言古〉，頁21。

¹⁰³ 同前註，〈休園自題三首〉，卷2〈四言古〉，頁22。

¹⁰⁴ 同前註。

營中，園林更趨近於休養保真、社交應酬的個人天地。其他來遊賓客，亦繼續深化上述的園主形象以及人地關係。如呂謙恒云：「邱壑天民道自尊，百城南面足朝昏。」¹⁰⁵則指園主的園居氣象，凸顯其在野閒逸之姿態。在後人的經營下，休園所展現的人地樣貌，乃是主人一派靜養淡泊、悠然離塵的棲隱陶然。

若就俠如當年人生決斷來看，明末之時，本不欲捲入政治場，卻因其兄元勳之死，選擇和朝廷接觸；易代之後，鄭俠如不仕作為舊朝認同的自我安頓，卻專力栽培後代，鼓勵仕進，以「家」為重，是「遺民不世襲」的具體實踐。¹⁰⁶但上述心跡，卻在《揚州休園志》的重層詮說、追述中，展現不同的人地意義。清初揚州受清廷兵禍甚烈，《揚州休園志》一方面保留俠如拒仕新朝的「遺民」姿態，或有維持家族聲望、尋求地方士人認同的期待；一方面園志將俠如「休」的複雜心跡重新定義為「逸」，並形塑出不慕榮立、著重自我修養的文士風姿，亦有避免政治利害網羅的考量。而鄭慶祐《揚州休園志·自序》：「有明末年，先高王父辭職歸里，購朱氏、汪氏園於宅後，……，及我朝定鼎，海宇昇平，遂合二園而新之，顏之曰：休園。」¹⁰⁷更將俠如建築休園的行動與清廷政局逐漸安穩的氣象相互連結。此一園林人地關係「由遺到逸」的形象塑造，使得「休」之意，在文字賦義過程中，重層轉化，展現了園林空間意義變動的「不常」。或可視為家族世代交替後的必然趨勢，但也不妨視為鄭氏後人面對時勢多方力量拉鋸下，透過文字言說維護家族存續之「常」的生存之道。

四、家族人地典範的塑造

如鄭元勳提到：「吾家世有隱德，無聞達云。」¹⁰⁸此一「隱德」的發微，也

¹⁰⁵ 〔清〕呂謙恒：〈三葺休園〉，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頁 3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93。

¹⁰⁶ 遺民後代轉向參與清代科考，乃是普遍現象，參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食貨》第 15 卷第 9、10 期（1986 年 4 月），頁 435-445。遺民在時間推進中，有其對自我所持身份的思考和義界，趙園認為是遺民現象的「時間（有限）性」，見氏著：《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作為一種現象的遺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68-174。

¹⁰⁷ 〔清〕鄭慶祐：《揚州休園志·自序》，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

¹⁰⁸ 〔明〕鄭元勳：〈先妣張太夫人行述〉，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6〈行狀〉，頁 6b，

是《揚州休園志》措意的書寫重心。相對於家族人物和園林空間共構的人地意義外，《揚州休園志》在塑造鄭氏先祖人物形象之時，特別留意祖輩的「忠義」事蹟，強調鄭氏是名門之後，並以男性成員的「俠義」、「忠貞」、「公益」的精神加以展示。同時，《揚州休園志》大量載錄女性族輩的事蹟，更試圖通過女性形象的塑造，匯通男性「忠義」與女性「貞節」，使此一詞彙與道德倫理價值相合，更有力地譜寫家族印象。下將說明《揚州休園志》塑造鄭氏家族「典範」的多層內涵。

（一）從「忠義」到「公益」的價值實踐

《揚州休園志》在追述祖先的過程中，特別回顧先祖的「忠義」事蹟。如艾南英〈太學東里鄭公行狀〉有云：「遠祖文顯，登宋王十朋榜進士。入國朝，建文初，鄭道同以進士官御史革除時遲。其兄河南參政桓以兵入援靖難。」¹⁰⁹言鄭氏從宋代遠祖以仕宦顯，明初兩祖輩鄭道同、居貞參與靖難的事蹟，此為鄭氏「忠義」形象的基礎根源。陳繼儒〈潔潭鄭翁傳〉指出此一忠義精神隨世代而傳遞：「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歟長齡鄭氏為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忍絕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祚於永永也。」¹¹⁰又於〈太學東里鄭公傳〉中再次強調鄭之彥為「建文死節鄭居貞之支裔」¹¹¹賦予鄭氏一門為國盡忠的形象。在不同世代的人物印記中，身為忠義名門的血淚刻痕被反覆強調。始終貫串世代血脈，未曾磨滅。許承家（?-?）〈鄭中翰四十壽序〉：「明居貞、道同公，殉靖難節，世有忠聲。……厥後子孫多顯仕，半留豫，半居歙。兩家皆守先世忠貞節義，以為家法。」¹¹²通過《揚州休園志》的敘述，將原本祖輩

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436。

¹⁰⁹ [清]艾南英：〈太學東里鄭公行狀〉，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6〈行狀〉，頁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425。

¹¹⁰ [明]陳繼儒：〈潔潭鄭翁傳〉，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4〈傳〉，頁3b-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77-278。

¹¹¹ [明]陳繼儒：〈太學東里鄭公傳〉，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5〈墓誌〉，頁3b-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279。

¹¹² [清]〈筓溪鄭君傳〉，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3〈序〉，頁39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47。

成員政治場域上的生命抉擇，轉化為成員個體道德持守乃至代傳不移的家法規訓。

此後，鄭氏成員仍於明末清初的紛亂局勢中，持續以生死實踐延續此一家族歷史記憶。首先，明末高杰兵亂揚州，元勳曾有恩於高杰「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啟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競疑元勳通傑，遂遇害。」¹¹³不幸身亡。元化之子鄭為虹（1622-1646），曾佐南明唐王，駐仙霞關，於清兵南破城時殉國。¹¹⁴此如楊汝穀強調：「侍御伯諱元勳、兄諱為虹，皆死前明國難。尤世所豔稱。鄭氏一門薑桂之性，忠鯁之氣，水木本源所從來遠矣。」¹¹⁵將殉難成員的生死抉擇，和祖傳「忠義」形象一脈貫串。鄭熙績〈讀伯父天玉公殉難贈言有感〉

吾家自昔篤忠貞，一旅曾摧靖難兵。糧盡乏援身被執，臨刑慷慨殊錚錚。
猶子遠任番禺令，聞命含悲心惻驚。投繯就義身先死，表忠祠內雙題旌。
宗支播遷籍邗上，清白家傳代有聲。……天生忠烈紹開國，祖武其繩侍九京。
聖主右文修勝史，表揚行且慰精誠。二十五齡垂不朽，（伯父盡節時年甫二十五）捧讀哀章淚欲盈。¹¹⁶

詩後有他人評語云：且見一門忠貞，與有明國運相終始夫。豈細故序次森嚴，足當詩史。¹¹⁷

元勳、為虹在朝代運末之際，復刻了家族先祖的生命經驗，成為鄭家忠義新典，甚被視為與大明國運相終始的連結。

俠如雖未殉難，但《揚州休園志》的諸多紀錄則強調突出其身為士大夫敢於衝撞權貴、忠於國家的義行。杜濬〈俟菴先生傳〉、¹¹⁸王猷定（1598-1662）〈鄭水

¹¹³ 〔清〕夏燮：《明通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附編卷1上，頁698。

¹¹⁴ 〔清〕陳鶴記載：「大清兵抵仙霞關，長驅直入。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縱民出走，自守空城，與給事中黃大鵬並被執，死之。為虹年二十有五也。」見〔清〕陳鶴：《明紀》（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卷59，頁623。

¹¹⁵ 〔清〕楊汝穀：〈箬溪鄭君傳〉，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4〈傳〉，頁3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317。

¹¹⁶ 〔清〕鄭熙績《含英閣詩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4冊，卷4〈七言古〉，頁31。

¹¹⁷ 同前註。

¹¹⁸ 〔明〕杜濬：「石齋黃公以建言被逮，過邗江，公挺身周旋，不畏邏者。」參見〔明〕杜濬：

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¹¹⁹分別提及晚明黃道周、袁繼咸獲罪，路過揚州時，俠如無畏當道，果敢挺身迎送的英勇事蹟。至於徐元文記錄二事：揚州郝公死於張獻忠難，其子受富人侮辱，俠如知會諸生數百人討之。高郵孔孝子抉目救父，事久不傳，俠如詳之，並告有司，使載郡志。¹²⁰皆可見俠如熱腸、士行志氣。

在《揚州休園志》所描繪的家族圖像中，還保存另一條相對於「忠義」家風形象的支脈。董其昌（1555-1636）〈太學東里鄭公墓誌銘〉說明此一精神的源頭：

遜國之鄭，媿方與鐵，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破巢存卵，顛木於槃。……魯連排難，倪說解結。隱豹而文，履虎不啞。掩荊高介，如田薛壇宇，其躬著蔡，其舌千里，誦義一經。貽厥孝秀，鵲起家聲。¹²¹

強調遷揚後鄭之彥立家旺族，行事仗義好義、助人解紛，並以先秦魯仲連、倪說之典，凸顯好義精神，甚有「俠」之風範。其後又以孟嘗為喻，強調其洞「隱豹而文，履虎不啞」卓有識見、能察識大局，而得保身安泰。杜濬〈侯庵先生傳〉亦云：

鄭之遠祖有居貞參政、道同御史，俱殉節死。故鄭氏世多好義而淡於榮利。侯菴先生風骨凝然，不替祖風而出之。以豈弟樂易不矜不偽，子孫繼之。罄無不宜。噫！非雙忠之報歟！¹²²

〈侯菴先生傳〉，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4〈傳〉，頁 12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94。

¹¹⁹ 〔明〕王猷定：「袁公治郎，以襄事被逮，道揚州，至者益罕。公獨操舟以迎左右。」參見〔明〕王猷定：〈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清〕鄭慶祐：《揚州休園志》，卷 2〈壽序〉，頁 8a-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105-106。

¹²⁰ 〔清〕徐元文：〈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任工部司務崇祀鄉賢侯菴鄭公暨敕封孺人元配汪太孺人合葬墓誌銘〉，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5〈墓誌〉，頁 12b-13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362-363。

¹²¹ 〔明〕董其昌：〈太學東里鄭公墓誌銘〉，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5〈墓誌〉，頁 7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351。

¹²² 〔清〕杜濬：〈侯庵先生傳〉，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4〈傳〉，頁 1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91。

將鄭氏遠祖殉國「忠義」形象展示替換為後代子孫內修式的道德內質，特別強調「好義而淡於榮利」，也刻畫遺民家族立足地方的社會形象。此外，園志相關紀錄也凸顯鄭俠如在揚州地方關懷民生的行動：「先生嘗出粟以賑通邑之饑，又嘗創育嬰堂以育貧家舉子女之不能養者」、¹²³與妻子汪氏「出粟周閭里困乏，不責償。又創育嬰堂乳貧家子女之生而不能舉者，歲以為常。所全活不可勝計。」¹²⁴積極周濟鄉里，¹²⁵此外，俠如著有《休園省錄》、《休園邇言》，兩書今不見傳，然從《揚州休園志》所收序言可知其內容為俠如嘗試以教訓善惡、端正風俗為期。如許承家「於是士介舅氏憫世風之敝，而作邇言」，¹²⁶杜濬《休園邇言·序》感嘆：「世之為善者常少，為不善者常多，何也？風氣為之也。」¹²⁷提到俠如著書針砭時況、期待促進地方良善風氣。從此角度來看，《揚州休園志》賦予家族人物與世、地方應接的意義，試圖轉化殉國名臣的「忠貞」成為易代後地方仕紳的「公益」，於新世代再啟家族新勢。

（二）女性的「持家」、「貞節」形象

相對於上述由鄭氏家族男性成員呈現的「忠義」形象，《揚州休園志》亦中可見大量女性身影，¹²⁸以女性為書寫對象的篇目幾乎涵括揚州鄭氏各世代女主，可見家族女性成員備受重視。

¹²³ 同前註，頁 1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91。

¹²⁴ 〔清〕申維翰：〈鄭水部配汪太君傳〉，卷 4 〈傳〉，頁 15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300。

¹²⁵ 有關明清士人以園林為基礎，實踐社會慈善事業的理想，見韓德琳著，曹曄譯：《行善的藝術：晚明中國的慈善事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年）。相關具體也如明末祁彪佳建構寓山園時，同時在家鄉進行賑濟施藥，等社福工作。見曹淑娟：〈寄寓、歸守與出離——寓山三賦對主人與園林關係的思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3 期（2005 年 11 月），頁 62-66。五畝園也出現如義塾、存義堂骨塚、吳氏義莊等景觀，說明園林作為士人公益價值實踐的中介意義。參葉叡宸：《地因人重，即景見心：清代地方園林志的典範追尋與文本重構》，頁 271。

¹²⁶ 〔清〕許承家：〈休園省錄序〉，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3 〈序〉，頁 4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186。

¹²⁷ 〔清〕杜濬：〈休園邇言序〉，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3 〈序〉，頁 6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189。

¹²⁸ 有關《揚州休園志》書寫女性的篇目文類請見「附錄二」所示。

在這些女性先祖的描繪中，《揚州休園志》的紀錄並不同於傳統女性貞節列傳著重女性角色對外部社會儀俗、教化關懷的意義，¹²⁹而是關注女性對「家族內部」的貢獻。書寫重心如下：

首先，書寫者多強調女性家長主持家計之不易。俠如之後，為光、熙績、玉珩皆早逝，女性家長是鄭氏得以延續傳嗣、完成世代交替的關鍵。其中，又以為光之妻雷氏事蹟最為人所稱頌。俠如之後，鄭氏血脈遭遇極大困境。鄭為光早逝，不久鄭俠如死，俠如孫鄭懋嘉相繼而亡，公、夫、子皆喪，僅憑己力獨力支撐，撫育玉珩、玉璋兩幼孫。雷氏不僅嚴以律己，養護兩世之孤，據他人所述「遇有不利於夫家者，則不惜挺身任之，詞氣勃發，不直不止，非明於大義而能然乎！天生太恭人，所以相鄭，此鄭氏所宜百世祀者也。」¹³⁰以家庭倫理的「大義」讚揚，足見其為鄭氏血嗣得以延續不輟之關鍵人物。如是女性護家形象也持續在《揚州休園志》的紀錄中複製與再現，如鄭慶祜〈先祖妣仲太恭人行述〉提到祖母仲氏：「吾宗祖母素明敏，能臨決大事，乃力贊兩太恭人治喪祭，葺田廬，議昏嫁。內庀家事政，外捍強禦，一時環集窺伺者，稍屏息以退。」¹³¹又紀錄母親李氏〈先妣李太恭人行述〉：「凌孀摧孤者，環至畢集。雖吾叔極力支禦，不能遽息。吾母奮然起曰：『吾為鄭氏一塊肉，忍自遮恤顏面，以任他人蹂躪，不一痛哭陳冤乎！』」¹³²宮煥文〈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則言慶祜另一母高氏在李氏去世後，承接衛護家庭的重責：「近十數年來，門戶支持、風雨捍蔽俾其家平安靜無憂于內訌外侮者，尤高恭人之功也。」¹³³突出女主相續持操家業、護幼圖存的苦心與英勇。

其次，園志強調女性家長的對男性成員主導家務內外的支持，以及有意識的

¹²⁹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潔觀念的嚴格化》，《文史叢刊》之 10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8 年），頁 129-166。

¹³⁰ 〔清〕張恕可：〈鄭節母雷太恭人行狀〉，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6〈行狀〉，頁 25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473。

¹³¹ 〔清〕鄭慶祜：〈先祖妣仲太恭人行述〉，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6〈行狀〉，頁 40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04。

¹³² 〔清〕鄭慶祜：〈先妣李太恭人行述〉，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6〈行狀〉，頁 45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13。

¹³³ 〔清〕宮煥文：〈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2〈壽序〉，頁 40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170。

教育後代。如艾南英〈鄭年伯母張太君六十壽序〉稱揚之彥妻汪氏：「東里公排難解紛如魯仲連，而太夫人不有其俠？東里公操海王之策，策其部伍，佐鯁使者，備廷議，而太夫人不有其智？東里公急交游、重然諾，而太夫人不有其信？東里公課子弟，彬彬為時聞人，而太夫人亦不必有師友義訓為聲？稱然，是數者，非太夫人之德，使東里公無內顧外顧，以專志上下之交，則東里公無所藉以有成，是坤道也。無成，而代有終。」¹³⁴在他人眼中，優秀女主的付出與操持、犧牲，是鄭氏男性成員得以在社會交遊、公領域實踐德行的重要關鍵。姚思孝（？-？）〈鄭母張太君傳〉認為之彥「豁達大度，曲敦信義以完好者，母力居多焉。」¹³⁵指出鄭氏有德，實為母力家教之功。如鄭元勳〈先妣張太夫人行述〉言文士萬茂先作客鄭家，後病，母親「每旦促兒視之，曰：『聞萬先生善士客途無依，爾往視，藥糜驗疾增減。』既死，泫然出涕者竟日。」¹³⁶其後鄭母更誨訓：「朋友之禮於我館於我殯」強調母教對此事的影響力。而鄭俠如無畏迎黃道周、袁繼咸時，亦是在女主的鼓舞下，方成「義行」。¹³⁷當之彥過世後，張氏「慟不欲生，尋跽諸子於庭兒訓之曰：爾父留有餘不盡之澤以遺後裔者，非侈華美相尚也。行正事、建正言、交正人，不有先世之忠節可法乎？……緣遠祖居貞公以參政事，建文帝靖難師起，募健卒三千勤王……弟進士道同為御史，聞而自經，一時表為雙忠云。」¹³⁸主動擔起家中訓育之責，鄭元勳追述母親之言：「嘗言不願爾等富貴，但勿忝先世忠節家聲足矣！」¹³⁹強調母親有意追溯歷史、為子孫重述先祖榮光，並從中生發家訓，以此作為勉勵。

¹³⁴ 〔明〕艾南英：〈鄭年伯母張太君六十壽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2〈壽序〉，頁 2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94。

¹³⁵ 〔明〕姚思孝：〈鄭母張太君傳〉，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4〈傳〉，頁 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88。

¹³⁶ 〔明〕鄭元勳：〈先妣張太夫人行述〉，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6〈行狀〉，頁 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439。

¹³⁷ 〔明〕王猷定：「夫人曰：『袁公易懼哉！』具酒食，俾公送之。」，〈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2〈壽序〉，頁 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106。

¹³⁸ 〔明〕姚思孝：〈鄭年伯母張太君六十壽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4〈傳〉，頁 9b-10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288-289。

¹³⁹ 〔明〕鄭元勳：〈先妣張太夫人行述〉，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6〈行狀〉，頁 7b-8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438-439。

在《揚州休園志》的回憶中，眾人將鄭氏教育與家風的養成，歸力於女性長輩的苦心泣血的堅勇不拔，認為是鄭氏一門得以續命、順利達成世代轉換、承傳家風的關鍵。園志這類譜寫，形塑歷代女主類似的性格氣質與行事風格，亦有「傳承」意味。

此外，部分書寫者也嘗試串連家族女性的「貞節」，¹⁴⁰並與家族男性的「節義」敘述相呼應。俠如〈哭字程氏亡女文〉提到女兒與程啟善有婚約，啟善因救父意外早亡，鄭女「即解綺縠、卻珍膳及傅脂飾粉之事，一切罷去。」¹⁴¹以剛烈之姿，立誓未過門守節，終至病歿，俠如更言：「嗚呼！汝貞之極，又孝之至也。」¹⁴²陳堯勳〈程孝子啟善聘鄭氏貞女傳〉提到：「舊史氏曰：女不幸著節，猶子不幸著孝，亦猶臣不幸著忠也。」¹⁴³凸顯女性之「貞節」與男性之「忠孝」、「節義」的道德性格相互鏈結。而不同世代女性的「道德實踐」，遂成為一項值得留意與「傳承」家族記憶。

上述有關鄭氏的女性形貌的描繪，是經過揀擇的成果，¹⁴⁴縱使在男性缺席的狀態下擔負家計、世代傳遞的使命，但女性其實從未擁有自我的聲音，後人也無從掌握鄭氏家族女性在長期擔負存續責任的真實心理狀態和情感曲折。是故，在《揚州休園志》中被「陳列」的女性成員，無論是協助鄭氏家族男性成員達成士大夫道德價值的追求，其長期的道德堅持，成功維繫夫家子嗣命脈、督促讀書中舉、提醒後代遵從家風，都是一種明清士人對家庭女性角色的想像。這些女性群

¹⁴⁰ 相對於喪夫後持守家庭維繫宗嗣命脈，鄭俠如女兒的「殉節」，則是另一種女性的道德實踐型態。見費絲言區分「守節」／「殉節」，氏著：《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潔觀念的嚴格化》，頁 2-9。

¹⁴¹ 〔清〕鄭俠如：〈哭字程氏亡女文〉，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5〈祭文〉，頁 36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409。

¹⁴² 同前註。

¹⁴³ 〔清〕陳堯勳：〈程孝子啟善聘鄭氏貞女傳〉，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4〈傳〉，頁 33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315。

¹⁴⁴ 如趙橙論明清園林中的女性空間，通過詩文、圖像，以社交活動、女性文學活動、婦職教化、情慾等面向，思考女性作為男性凝視客體，以及成功塑造女性主體價值的意義。見氏著：《內外之間：明清園林中的閨秀空間》（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21 年）、〈虛實相生：明清園林繪文本中所見之園林與性別空間（16～19 世紀）〉，收入陳嘉禮、林稚暉主編：《論道稷下：新材料、新方向下的中國文化》（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23 年），頁 173-196。在趙文所引材料多為女性作者，相對於此，《揚州休園志》皆是男性掌握書寫權力。

像，即如張恕可（?-?）記述：「太恭人苦節純孝，近代罕觀，廣陵縉紳家久已豔稱。」¹⁴⁵更被打造為地方社會的公共範式。整體而言，鄭氏女性實呈現失語狀態，且在園志書寫中被轉化為家族立基地方的有力資源。

李惠儀論清初歷史記憶時，特別關注揚州地方女性在易代戰爭的死難經驗與象徵意義，女性作為「記憶」書寫、論述與解釋的媒介，在褒貶、責難與同情的音聲中，涉及舊朝男性觀視的「罪／罰」的歷史詮釋，以及異族新政運作下的「褒忠」企圖、地方歷經戰亂後，從毀滅到復興的表徵與背後創傷和壓抑。¹⁴⁶《揚州休園志》藉女性作為男性書寫者的記憶媒介，進而形塑「女性」在家族忠義、俠義、公益以及持家興復的角色，則是另一種微觀視野的歷史追想和有策略的人物模塑。鄭氏女性成員出入「生／死」之間，呈現了保守、自持、果敢與無條件地奉獻支持夫家的女主形貌；和上述李惠儀所論易代之際，文人書寫諸多揚州女子形象：奇舛命運無法自主而失節的女子、歌舞麗人、褒忠烈女相比，¹⁴⁷《揚州休園志》的「女性形象」背後連結的道德價值，亦是另一種男性期待彰顯自身（家族）意欲主導下，刻意為之的表述話語。

從家族價值追求的角度而言，《揚州休園志》透露有關鄭氏家族「忠義」、「忠孝」、「公益」與「貞節」等倫理價值，此與其士商家族特質形成有意思的對照。余英時曾提問：「明清商人究竟關不關心道德問題？他們是否曾主動地去建立自己的道德規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們的道德源頭何在？又是通過何種具體的方式而得來的？」¹⁴⁸余氏探問商人於治生、社會行動中所展現的價值根源與傳統儒家士大夫的連結，提示了商人與士人道德理想的關聯性。《揚州休園志》展示鄭氏作為儒商家族強調道德，休園的構築與逐代修復，象徵家族的經濟實力，而在園志的撰寫中，又強調追求旌表、振起家聲、延續忠孝（義）的自我期許，說明了在維繫家庭、宗族發展的目標下，「道德」如何被作為一種資本，透過文學書寫行動的建構，達成其對士大夫傳統價值的追求。

總的來說，園志將家族的公共形象和歷史記憶、地方社會風氣緊密連結，具

¹⁴⁵ 〔清〕張恕可：〈鄭節母雷太恭人行狀〉，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6〈行狀〉，頁 25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473。

¹⁴⁶ 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7 卷第 2 期（2010 年 12 月），頁 289-344。

¹⁴⁷ 同前註。

¹⁴⁸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 年），頁 136。

體而微地揭示了明清士大夫面對家族意義承續的在地實踐。此即前述鄭氏在園林之「不常」中，提煉出人物「常」之道德倫理精神，進而確立家族在地方聲名與形象的最佳成果。

五、風流不墜此園林：《揚州休園志》中的園林與地方

相較於人物記憶圖像的塑造，《揚州休園志》書冠「揚州」之名，並在卷七、卷八收錄了大量的園林題詠，特意集結以空間為書寫對象的詩歌主題，可見編者在記錄時，亦留心園林在地方歷史序列的位置和意義。以下嘗試就園林與揚州地方的關聯性，說明《揚州休園志》如何連結家族與地方記憶，同時凸顯休園與鄭氏家族的特點。

（一）休園在揚州園林中的特色

從行政、經濟、交通的角度來說，揚州由於地理航運位置重要，加以朝廷設立鹽務官署，負責漕運、鹽務、河務等收益，成為明清江南商業重鎮。¹⁴⁹《揚州畫舫錄》即引劉大觀言：「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¹⁵⁰當地眾多的園林群落，是此一繁盛圖景的象喻，也成為人們表述地方記憶的重要介質。揚州園林由來悠久，宋人孫虎臣（?-?）所云：「儀真，江淮要區，多園池亭榭之勝。」¹⁵¹從宋代伊始，園林之勝即是重要的地方象徵。明清兩代，造園活動更達巔峰。劉鳳誥（1760-1830）〈個園記〉提到：「廣陵甲第園林之盛，久冠東南。」¹⁵²可見明清之時，造園已然成為當地普遍盛行的社會、文化風氣。清人李斗（?-?）更編有《揚州畫舫錄》，呈顯地方園林大觀。袁枚（1716-1797）言：

¹⁴⁹ 「江南」於明清的意義有二，其一為從行政區域劃分，約為今日江蘇、安徽二省範圍，包含江北；其二則由經濟區域分，僅有蘇南浙北，如李伯重八府一州說，見氏著：〈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頁100-107。本文所謂「江南地區」採取行政區的範圍。

¹⁵⁰ [清]李斗撰，涂雨公、汪北平點校：《揚州畫舫錄》，頁151。

¹⁵¹ 顧一平編：《揚州名園記》（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頁56。

¹⁵² 同前註，頁33。

記四十年前，余游平山，從天寧門外挖舟而行。長河如繩，闊不過三丈許，旁少亭臺。不過匿瀦細流，草樹卉歛而已。自辛未歲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來之意，賦工屬役，增榮飾觀，參而張之。水則洋洋然回淵九折矣；山則峨峨然陞約橫斜矣；樹則焚槎發等，桃梅鋪紛矣；苑落則鱗羅布列，闐然陰閉而霽然陽開矣。猗歟休哉！其壯觀異彩，顧、陸所不能畫，班、揚所不能賦也。¹⁵³

袁枚以己身遊歷經驗，對照今昔變化，展示園林榮景的盛況。阮元則提及「揚州府治在江淮間，土沃風淳，會達殷振，翠華六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於是綜蜀岡、平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¹⁵⁴關注經濟、政治層面，凸顯士人園林與地方史蹟、人文等集體記憶的成就。可見在明清之時，揚州城地方感的內涵，乃是由物質經濟的總體性成果、疊合悠遠人文風雅雙向共構而成。「園林」恰巧是此一地方感的具體表徵。

從地方園林發展史的角度來說，揚州西北郊蜀岡與鄰近的保障湖（瘦西湖）水域一帶，景色優美，宋代有歐陽修築「平山堂」最為著名。入清後，順治年間，王士禛主持虹橋修禊盛會，使得鄰近虹橋成為揚州城西北園林、名勝核心。康熙年間，汪懋麟修復平山堂，喚起該處的歷史記憶與人文榮光。乾隆時期，因乾隆南巡、地方商賈競相營構，形成著名湖上園亭群落，為清代揚州園林的典型。此外，明清以來，因揚州新城區的發展，於新城東南東關街附近，是為鹽商居住地。富裕的鹽商往往以園林作為物質與經濟地位的表徵，姚鼐（1731-1815）〈主園圖記〉言：「揚州郡邑，於天下最名繁會。居其間者率喜作園館，以靚麗相夸尚，連趾接蔭，隱映合分，跨川彌垺，或十餘里不絕。」¹⁵⁵追求華麗、爭相誇耀為清初揚州園林的大致樣貌。¹⁵⁶

《揚州休園志》所呈現休園和揚州地方的關聯，應是可以留心的面向。在諸多詩文紀錄中，《揚州休園志》強調家族在地方的人文精神與文化風範，以及歷代傳承不朽的特質，表露休園和揚州城市空間的「即／離」關係——明處於城市，

¹⁵³ 〔清〕袁枚：《揚州畫舫錄·序》，〔清〕李斗撰，涂雨公、汪北平點校：《揚州畫舫錄》，頁9。

¹⁵⁴ 〔清〕阮元：《揚州畫舫錄·序》，〔清〕李斗撰，涂雨公、汪北平點校：《揚州畫舫錄》，頁6。

¹⁵⁵ 〔清〕姚鼐：〈主園圖記〉，顧一平：《揚州名園記》，頁30。

¹⁵⁶ 陳從周：《揚州園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1983年），頁8。

不受時風所染。休園既與地方有深刻的鏈結，但也具有自身的獨特性。

從座落地點、方位而言，休園介於運河西側與北側、小秦淮河東側，即清代揚州新城鹽商居住範圍。¹⁵⁷從空間與建築型態觀，揚州當地徽商引進徽州與蘇州香山建築樣式。¹⁵⁸故揚州園林多疊石，以山景為勝，¹⁵⁹休園中「石山為最」反映地方築園風氣。¹⁶⁰然整體空間氛圍與型態、建築特性又有與周遭環境區隔的考量。鄭氏休園在鄭氏家宅後，¹⁶¹中隔市街，須經閣道穿行而過，方能見園，有意和外部市廛繁華區隔。¹⁶²顧彩（1650-1718）提及：「辟園依邗上，開筵近輞川。」¹⁶³認為休園可媲美唐代王維輞川別業，呈現士人棲逸精神的美範。如常時泰（?-?）：「休園何在在蕪城，往來冠蓋日縱橫。鳴鑼鼓柁競奔逐，何人剩有造園情」、¹⁶⁴築有九峰園的汪玉樞（1688-1757）言：「粉飾時方尚，繁華此獨刪。」¹⁶⁵指出休園雖近城市，但有別於地方追求繁麗時風的獨特價值。

在時人眼中，休園不同於揚州豪奢、逸樂得獨特美感原因有二，其一，選址得宜，此如吳煒（?-?）提到：

出揚州郭遠近數十里間，以園名者，蓋亦不下數十。若池臺林木，不假雕飾，巋然獨秀于城市中，則無出吾鄉鄭氏休園之右者。¹⁶⁶

¹⁵⁷ 團昇言：「園在揚州郭內，流水橋東。」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首〈序〉，頁 1a。

¹⁵⁸ 陳從周：《揚州園林》，頁 5。

¹⁵⁹ 許少飛：《揚州園林小史》（揚州：廣陵書社，2018 年），頁 60-158。

¹⁶⁰ 〔清〕方象瑛：〈重葺休園記〉，《揚州休園志》，卷 1，頁 3a，總頁 49。

¹⁶¹ 〔清〕宋和：〈三修休園志〉：「寬五十畝，南向，在所居後間一街，乃為閣道，遙屬於園東偏，雖遊者亦不知越市以過也。」《揚州休園志》，卷 1，頁 14a-14b，總頁 71-72。

¹⁶² 閣道也成為清代揚州園林獨特的園林空間原型，見都銘：〈意義與空間原型的形成——揚州休園修葺研究〉，《建築遺產》2021 年第 4 期，頁 29-34。

¹⁶³ 〔清〕顧彩：〈重過休園八首〉，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7〈詩〉，頁 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48。

¹⁶⁴ 〔清〕常時泰：〈重葺休園〉，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7〈詩〉，頁 7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43。

¹⁶⁵ 〔清〕汪玉樞：〈過休園三首〉，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7〈詩〉，頁 22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632。

¹⁶⁶ 〔清〕吳煒：〈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2〈壽序〉，頁 35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159。

提及休園稍遠鬧區，且不假雕飾。冒春溶（1702-1760）言：「名園容我到，位置與人殊」、¹⁶⁷宮煥文（?-?）言：「地薄城闐夾民廛，而水木明瑟，翛然自遠。」¹⁶⁸說明休園離塵不離城，在揚城園林群像中獨樹一格。鄭慶祜在園志也特列「園隱」一景題詠：「大隱在朝市，小隱居林藪。匿跡城中園，即此亦可守。」¹⁶⁹如同袁于令（1592-1672）提到：「未於城市遠，坐處若山間」、¹⁷⁰顧彩又云：「城市留高曠，壺中別有家」、「曲折新移徑，桃源別問津。閒儲管寧圃，不受庾公塵。」¹⁷¹居遊其間，可與繁華城市蘊藏各式可能的人事糾葛、權位利祿、利害關係劃出界線。在如是自足暢遂的微型天地中，居者、遊人可以獲得暫時的超離，既處城市中，又能獲得自足閒寧的一方天地，脫離了外部人世的框架侷限，避免可能招致的傷害，充滿無地點感，展現文人園林系統「差異空間」的空間感知。¹⁷²

其次，休園由於歷史悠長，加以持護得當，提供園中生態充分長養的可能，更富生機雅趣。茂盛草木、時序花卉與山石水景搭配合宜，在隔絕獨立的空間中予人清明朗麗、回還自然野趣的體觀經驗。如是空間氛圍，並不過分刺激遊觀者的耳目心神，保留了一份渾然素樸的幽趣。同樣在揚州建有小玲瓏山館的馬曰琯（1688-1755）、馬曰璐（1688-1769）兄弟稱賞：「今朝孟夏弦月下，復此相聚探幽深。在城在野了莫辨，深林大木成古今」、¹⁷³「歌吹喧中塵漠漠，一片清陰占

¹⁶⁷ [清]冒春溶：〈春日過休園三首〉，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10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11。

¹⁶⁸ [清]宮煥文：〈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2〈壽序〉，頁4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169。

¹⁶⁹ [清]鄭慶祜：《揚州休園志》，列景，頁6a，總頁39。

¹⁷⁰ [明]袁于令：〈休園讌集八首〉，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1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32。

¹⁷¹ [清]顧彩：〈重過休園八首〉，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10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49。

¹⁷² 對中國文人而言，園林可以成為他與現實世界接觸啟閉的中介，形成一處消解自身危機、脫離現實困境的「壺中天地」。相關討論參見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朱衣仙：〈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第34卷（2017年12月），頁1-48。

¹⁷³ [清]馬曰琯：〈初夏集休園〉，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19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26。

林薄。揚州池館競繁華，掃去朱丹留淡泊。」¹⁷⁴在繁鬧喧闐的繁華之外，別有脫盡豔麗的淡薄雅緻。如張鈿（?-?）：「巖壑層層曠，軒楹處處幽。干雲森古木，傍水架方舟」、「寒光淡心跡，塵垢此俱刪」、¹⁷⁵蔣仁（1743-1795）：「古木綠到天，奇峰峭拔地。揚州富園林，規模此獨異。墨池流灣環，梅塢徑深邃。」¹⁷⁶強調入園所感受到的古、奇、幽、深、淡，此一獨特空間規模與型態是遊人得以獲致「未遠卻離俗」殊異美感經驗的具象表徵，呈顯園林與揚州城市的區隔，展現休園的特出之處。故湯正垣（?-?）等人強調：「結構非關縱逸情」、「多年樸畧基猶在」、¹⁷⁷陳瓊仙（?-?）：「位菊置松存簡疏樸，疏泉漱石見清粼。百年邱壑精神在，一日休閒真面目」、¹⁷⁸李肇輔（?-?）：「因知前輩任天真，不尚雕華尚樸素。」¹⁷⁹說明休園不刻意爭逐逸樂、且存有歷世經營傳續的素樸美感，而能淡遠悠長。走過明末清初戰亂帶來破敗與衰頹，揚州迎來另一波繁榮高峰，豪奢窮欲遂成築園主流，相對於揚州其他園林，休園「不學時新金碧輝，祇留故步林泉爽。」¹⁸⁰有著歲月積澱的內蘊光輝和古雅風範、自然幽趣，並不沾染慾望汗漫、人工造作的時風，別有超逸脫俗的清新姿態。

（二）休園與揚州的地方記憶及象徵意涵

園林的物質性、文化象徵意義，乃與整體地方興衰狀態相互關聯。閔華

¹⁷⁴ [清]馬曰璐：〈初夏集休園〉，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20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27。

¹⁷⁵ [清]張鈿：〈休園賞梅〉，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04。

¹⁷⁶ [清]蔣仁：〈過休園〉，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31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50。

¹⁷⁷ [清]湯正垣：〈重葺休園二首〉，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1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68。

¹⁷⁸ [清]陳瓊仙：〈重葺休園二首〉，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7〈詩〉，頁2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50。

¹⁷⁹ [清]李肇甫：〈休園行〉，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1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24。

¹⁸⁰ [清]吳桐：〈四葺休園〉，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16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20。

（1697-1773）提到：「吁嗟甲申之次年，蕪城草木成飛烟，惟剩西家滿園樹，有如閱世不死之老仙。而今又及百年外，喬木清風故家在。」¹⁸¹以「閱世不死之老仙」、「百年」指識休園久存地方之特徵，涉及園志描述家園於地方歷史易變中的獨特位置與時間性存有意義。

如梅爾清討論 17 世紀揚州歷史時，特別關注文士認同的凝聚以及從中建構的地方記憶，指出揚州文士通過地方文化典範、象徵的追復，使戰後殘破的揚州城得以重振，再創人文新猷。¹⁸²「歷史感」與「歷史榮光」的追復，乃為清初揚州地方文士所措意。而休園的落成，正處於上述清初人文活動、地方集體意識匯聚的時間區段。《揚州休園志》收錄文士群體題詠，希望突出休園在地方歷史文化譜系中的位置。如方象璜：「七松高致久名家，舊有園林邗水涯。」¹⁸³以名家和邗水，指出園林和揚州地方的歷史、文化記憶連結。或如程文蔚（？-？）：「喬木成陰地少塵，名園久占廣陵春。」¹⁸⁴透過「廣陵」古稱，試圖賦予園林歷史縱深的意義。至於顧彩言：「牧之未曾到，何遜見無由」、¹⁸⁵殷王嶧（？-？）：「添栽彭澤柳，補種法曹梅。」、「亭擬王官谷，園鄰廿四橋。」¹⁸⁶上溯六朝何遜詠梅的事典，召喚晚唐杜牧廿四橋的明月圖景，呈現以休園為基礎的觀看視點，收納地方著名歷史文化事典，鏈結休園和揚州城人文記憶的關聯性。

在地方人文活動的面向上，《揚州休園志》通過園林豐富的雅聚情態，呈現鄭氏的領袖地位。如許承家〈重葺休園記〉所言：「鄭氏之園已甲於揚郡，一時

¹⁸¹ 〔清〕閔華：〈初夏集休園〉，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21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630。

¹⁸² 梅爾清提到清代揚州文士即通過如平山堂、文選樓等人文典範的追憶，重樹地方的人文精神。見梅爾清（Tobie Sarah）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

¹⁸³ 〔清〕方象璜：〈重葺休園二首〉，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5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40。

¹⁸⁴ 〔清〕程文蔚：〈休園讌集〉，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48。

¹⁸⁵ 〔清〕顧彩：〈重葺休園四首〉，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48。

¹⁸⁶ 〔清〕殷王嶧：〈三葺休園用何將軍山林十首韻〉，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頁 589。

公卿大夫，士及縉衲來遊者，莫不題詠壁上。」¹⁸⁷不同身份者皆到此遊觀訪勝，凸顯鄭氏家族儒雅的文化形象，休園可謂承繼鄭元勳影園之後，再現晚明士人風華的重要標誌。宋和〈三修休園記〉言：「揚為南北之交，人文舟車之所必由也。鄭氏世為文盟主，凡名之著者，莫不來集斯園。」¹⁸⁸又如吳綺：「見說舊時留硯在，應知愛客是家風。」¹⁸⁹這份人文精神乃是重要家風，也是鄭氏與休園屹立不搖、受人矚目的重要原因。

相對上述由園林帶出揚州地方人文記憶「興」的互動脈絡與光輝成果，歷史與政治變局轉折帶來的巨大傷痛、死亡陰影，同樣銘刻在揚州的都市形象之中。六朝時期鮑照〈蕪城賦〉展示古揚州華麗與毀滅交錯的命運，明清之際，江左地方遭受兵燹巨創，揚州城破的慘烈情狀，重複歷史宿命輪迴。故繁華與毀敗不常，乃是一道城市的隱然傷痕，催生懷古傷逝的時間意識，《揚州休園志》也呈現了此一時間感慨，如方象瑛〈重葺休園記〉言：「夫江都，繁麗之區，故多園亭，然自隋煬以來，所謂『瑩苑』、『迷樓』、『竹西』、『歌吹』，固已不可踪跡矣」、¹⁹⁰顧彩〈重葺休園四首〉：「隋堤無剩蹟，金谷總休誇。」¹⁹¹在有關揚州的地方記憶中，帝王世家象徵權力的繁華與奢靡，暴起暴落，引動盛衰無常的落寞與空寂。程夢星（1679-1755）曾感嘆：「廣陵多園林，易世半傾倒。」¹⁹²凝聚諸多物質意義的園林也成為盛衰時間感知的重要中介。在上述以社會文化物質性為表徵的地方感中，休園特別受到時人推崇，李光地〈三修休園記〉即言：

¹⁸⁷ 〔清〕許承家：〈重葺休園記〉，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1〈記〉，頁 7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8。

¹⁸⁸ 〔清〕宋和：〈三修休園記〉，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1〈記〉，頁 1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71。

¹⁸⁹ 〔清〕吳綺：〈重葺休園並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7〈詩〉，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34。

¹⁹⁰ 〔清〕方象瑛：〈重葺休園記〉，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1〈記〉，頁 3a-3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49-50。

¹⁹¹ 〔清〕顧彩：〈重葺休園四首〉，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7〈詩〉，頁 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48。

¹⁹² 〔清〕程夢星：〈休園讌集〉，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9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606。

昔歐陽公記海陵許氏南園，稱其孝弟著於三世。謂其園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栖，不擇子而哺也。而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言園囿之興廢，關乎洛陽之盛衰。今鄭氏之園，其於前者既如此，而繼承於後者又如彼，視歐公所稱南園不啻過之。他日有記維揚名園者，吾知其必以休園為稱首，且將推本於今之天下，席豐亨，慶豫大，以江左第宅園林易人如傳舍者，而士大夫皆得遞傳而世享之，豈非承平之盛事哉！然則余為斯記，固非第記鄭氏一園之盛而已也。¹⁹³

認為士大夫之園林得以世傳，乃是關涉揚州地方運會變遷的承平時相。朱驥（？-？）〈三修休園賦〉言：

慨廣陵名勝之多湮兮，匪獨雞臺與玉勾。即一邱一壑之留連兮，往往轉瞬而成邱。惟谷口之佳構兮，園三葺而名休。此蓋水部曾孫之振古鑠今兮，能以一簣而擴三世之菟裘。¹⁹⁴

在地方名跡「轉瞬」即逝的喟嘆中，進一步讚揚休園獨立於此時間現象的人地基質，此與鄭氏在園林承傳行動中能夠實踐士大夫的價值理念相關聯。張雲章〈三修休園記〉指出：「揚州天下之衝，四方商賈之所輻輳而居。以及仕宦者既眾，則爭治為園林、臺沼、亭館之勝以自娛，而娛其賓。然而盛衰倏忽、聚散無常，數經其地者，往往感慨係之矣。求其世有顯人，為士大夫之指稱而不替者，莫如鄭氏。」¹⁹⁵他者起修園林，期待獲致自娛、娛賓的耳目快意，容易落入皮相，陷溺於成毀無常的因緣網羅。休園雖一定程度彰示了鄭氏家族在物質、財富上的基礎根底，本身亦具「聚散無常」的質性，然眾人所目所賞的重點並不在此，乃關注園林與家族共構之人文精神，此為鄭氏得以綿互相續的關鍵。如宋和提到：「鄭氏之有此園，歷四世，故其林木皆歲寒而不凋，石路踏莓苔而日厚，亦名園

¹⁹³ 〔清〕李光地：〈三修休園記〉，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0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3。

¹⁹⁴ 〔清〕朱驥：〈三修休園賦〉，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8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79。

¹⁹⁵ 〔清〕張雲章：〈三修休園記〉，見鄭慶祐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1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5。

之最古者也。」¹⁹⁶遊人言「古」與「不凋」，表面言景，實關注鄭氏家學淵源流遠。如吳瑛（？-？）言「當時賢士大夫以頌鄭氏之有世德也。夫以通門貴胄，歌臺舞榭自昔偏饒，況復爵埒崔珂，富驅卓室，結構雖閎，經營猶易，彼一時也。交口嘉賞，矜艷欲絕，豈徒踵事增華，俾後世誇耀云爾哉……鄭之先莫不崇德累仁、培植綿長，故能延休奕世，垂範後昆」、¹⁹⁷張四科（？-？）「玉津極繁華，金谷擅豪富。曾幾就傾頹，耐久遜樸素。」¹⁹⁸皆可見休園存續背後有著鄭氏家學綿長、高門有德、樸素脫俗的良好根柢。

又如殷譽慶（？-？）：「廣陵池館多湫喧，擅水木勝惟休園。鄭公鄉聯通德里，青青書帶草猶存」、¹⁹⁹冒春溶：「乾坤高士傳，花月輞川圖。書帶窗前草，牋詩是大儒。」²⁰⁰殷、冒二人以「鄭公鄉」用前人敬仰、禮遇鄭玄之事典，²⁰¹藉高士、大儒典範比附稱揚，凸顯揚州鄭氏一門才德兼具。相較揚州其他豪富園林倏忽成毀，休園代代傳承的儒風，不僅受人仰重，也在繁華落盡的物質性變化中得以久存。

對此，鄭熙績〈休園落成下帷漫興〉詩後有文友評語：

廣陵臺榭不乏巨觀，大都為逸豫宴遊之地。懋嘉兢兢以守先業，勤下帷為急，賢愚相去奚啻徑庭。²⁰²

¹⁹⁶ [清]宋和：〈三修休園記〉，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1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71。

¹⁹⁷ [清]吳瑛：〈書三修休園記後〉，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1〈記〉，頁20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83。

¹⁹⁸ [清]張四科：〈過休園〉，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34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35。

¹⁹⁹ [清]殷譽慶：〈休園賞梅〉，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3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594。

²⁰⁰ [清]冒春溶：〈春日過休園三首〉，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8〈詩〉，頁1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頁611。

²⁰¹ 《後漢書·鄭玄傳》言：「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屨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參〔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卷35，頁1208。

²⁰² [清]鄭熙績：〈休園落成下帷漫興〉，《含英閣詩草》，卷6〈七言律〉，集部74，《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頁64。

就前者而言，鄭氏一族以商賈起家，卻有意識地在世代傳承的過程中朝向儒雅士族的道途發展，「勤下帷爲急」說明家族繼任者有自覺地督課子弟、以學養爲目標，和地方其他園林好尚逸樂風氣形成強烈參照，呈現士大夫之園的特點。故李肇輔言：「君不見，石家金谷在河陽，鐵如意碎珊瑚長。蘭亭風味香千古，至今脩禊有餘香。蜃氣樓臺空碧澗，夕陽門戶終昂藏。」²⁰³豪族世家的權勢力量和揚州富庶繁榮的話語想像相互雜揉，精彩有之，終不免虛幻空無。故當時文士稱讚「誰解繁華占一邱，名園特冠古揚州」、²⁰⁴「風流不墜此園林」、²⁰⁵「若將諸園興衰量問東風，似此勝地盛筵常再有誰同？」²⁰⁶有德好文之家，雖處風雨飄搖，卻能以詩書之力、銜起風雅，進而傳香不朽。至於團昇提到：「複閣重樓，金碧炫耀，誠不逮近時園亭什一。而脩簣古樹，如倪迂馬遠之畫，筆墨外自有烟雲，則正處於材、不材之間，不務爲極盛，乃其所以不即衰也。」²⁰⁷其中「不務爲極盛」說明歷代休園主人能對物質性的追求有所警覺、反思與節制，通過不同於社會眾聲的風尚確立自我意義，進而得以跳脫「材／不材」的一般價值性判準，免於困執在世間權力、欲望競逐的單一面向，代表互遠久傳的人文精神，此爲鄭氏休園在揚州的指標性意義，亦是園林面對盛衰「不常」所展現「常」的永續意義。

整體而言，休園嘗試承續揚城風雅文化流脈，同時遠離競逐財貨、欲望喧騰的城市表象，盡可能在「盛／衰」、「華麗／毀滅」迭相錯雜的命運輪迴中，保持自身的殊異性，展現另一種人文精神價值，讓我們得以在明清易代的時間切面中，領略繁華揚州難得的風流文雅元素，此亦爲鄭慶祜通過園志所欲宣稱、追求「常」之家族風範。

²⁰³ 〔清〕李肇甫：〈休園行〉，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1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624。

²⁰⁴ 〔清〕李肇甫：〈休園行〉，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2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644。

²⁰⁵ 〔清〕李肇甫：〈休園行〉，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18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624。

²⁰⁶ 〔清〕李濟仁：〈休園雅集〉，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 8〈詩〉，頁 5b，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598。

²⁰⁷ 〔清〕團昇：〈序〉，見鄭慶祜編纂：《揚州休園志》，卷首，頁 2a，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25 冊，頁 3。

六、結論

透過園林文本編纂、製作的角度，有助於我們觀看明清士人建構家族歷史的課題。《揚州休園志》提供了一項具體而微的例證，使吾人能一探傳統士人面對家族價值的思索和書寫實踐。

誠如人類學者所認為，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一個群體歷史的延續必須透過社會記憶的機制才有可能，²⁰⁸文字書寫即是歷史社會主要的表現媒介。就傳承家族記憶的角度而言，中國自古即有譜牒系統，配合宗法、血緣的思維運作模式，紀錄特定人物行事、人物的世代與親倫關係，從而確保家族穩定延續。明清兩代出現的「家族園林志」，以家族園林為寫作主幹，試圖展現家族的情感記憶、祖先典範、公共形象，雖未必等同傳統譜牒與家乘，但不妨視為一新的家族記憶表述型態，具有獨特的文本質性和典籍意義。

從編輯動機、目的而言，《揚州休園志》宣揚家聲的背後不乏權力運作的考量。誠如社會學者所提示，為了「歸屬」，則必須「記憶」，²⁰⁹「記憶」作為歸屬的策略、途徑，在文本接受、閱讀中，應存有預設目標的引導、指向性。園林志的編輯，在情感層面上是出於對家中先人的景仰和企羨，然更為積極的意義在於「聚族」與「光耀」。在整體的文本呈現上，編纂者希望上溯俠如建設休園成果，重現家族昌盛圖景。因此，《揚州休園志》對記憶的回溯、重構、拼貼，又和園志編輯者所處的生命情境、欲求相對應。是故，選擇、回溯建構特定族史記憶，其實是編輯者面對家族現下存續、經營狀態的表徵和因應策略。

對內而言，通過園志纂輯，確立俠如和休園的意義位階，突顯自家在鄭氏族系中的地位。在感召、引發子孫對先祖的情思懷想的同時，更具有期許、督訓、教育之意，進而能持續承衍一姓家風。²¹⁰

對外來說，編輯者選擇以園林（家園）空間作為編輯核心，透露以家園輻散

²⁰⁸ 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頁19。

²⁰⁹ 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安斯加爾·紐寧（Ansgar Nünning）主編，李恭忠、李霞譯：《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1。

²¹⁰ 如許娘光曾指出傳統中國家庭「教育」的雙重意義「可以著重未來——注重青年人自身的實踐和發展、教育亦或可以承襲過去——依照前人的形象來塑造年輕的一代。」參見氏著，王芃、徐隆德譯：《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出版社，2001年），頁171。

至地方（鄉土）的意識，從而確立家族在地方社會史、文化中的意義序列。身處清初揚州此一敏感的政治空間，作為遺民後代，編纂園志應也有士人自我生存動機的考量。面對揚州城相關的戰爭傷痕，《揚州休園志》上溯遠祖在靖難對家國的「忠義」事蹟，一面連結元勳保衛鄉里的死難經驗，也積極敘述鄭景濂、鄭之彥、鄭俠如等人對地方公益的貢獻，嘗試彰顯家族和地方的歷史淵源和連結。同時，更邀集諸多故明遺老著作。凡此種種，都說明鄭氏希望在地方文化圈中爭取更多認同。

從文本生成的脈絡來看，《揚州休園志》大量收錄他者對自家的觀看、描繪成果，並由編者通過特定意識拼合，鄭氏家族的成員都是「被書寫」的產物，整個家族的紀錄也是一個「被製造」的過程。編者嘗試收攏、統合，遂使人物形象和家族記憶內容呈現一致性，透露「理想的家族樣貌」，凝塑一想像的共同體。然而，在共同體的生成中，其實又存在各世代、個體生命故事的差異。這些「被製作」的家族樣貌，未必和每位成員真實的內在情志完全貼合。譬如對「休」命意的體會與實踐上，可見到不同世代鄭氏成員因所處身份情境的不同，造成對休園人地形象詮釋的差異。在傳承、延續家脈的想像下，不同成員的複雜意志，雖被園志編輯者內心中對「家」的理想建構之終極目標所籠罩，然也偶爾會透露不連續斷面的黏貼痕跡。

因此，《揚州休園志》在追想家族的過程中，相關人文記憶的呈顯，不僅是純粹歷史的紀錄，更帶有選擇、去取、存留等行動中偏重的意圖，使得記憶風景有著不同層次的視角，從「遺」、「逸」、「憶」、「義」展示遺民士大夫家族面臨生存境遇的行動。這也說明園林志作為一種明清文學研究的新材料與思考路徑，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文人文化、思維模式以及生命實踐。

即如前言所提到，《揚州休園志》是鄭慶怙意識到以文字承載家族形象與聲名之「常」，展示園林之「不常」的具體行動。如是來看，有了文字護持和後代戮力持守的園林，承傳命運為何？慶怙之後，未見後人接手園志纂輯，而休園也易主為藥材商人陳氏所有。²¹¹歷史的相似性畢竟驚人，由商賈而儒林的休園，終

²¹¹ 據方志記載：「今歸蘇州陳氏，改名曰『徵源』。」見〔清〕江藩、姚文田等纂：《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31〈古蹟二〉，收入《中國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第41輯（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523。清人錢泳《履園叢話》記載：「陳見山，蘇州人，嘗賣藥邗上，以此起家，開有青芝堂，藥材為揚城第一鋪。得鄭侍御休園為別業。」見〔清〕錢泳著，張偉校點：《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57-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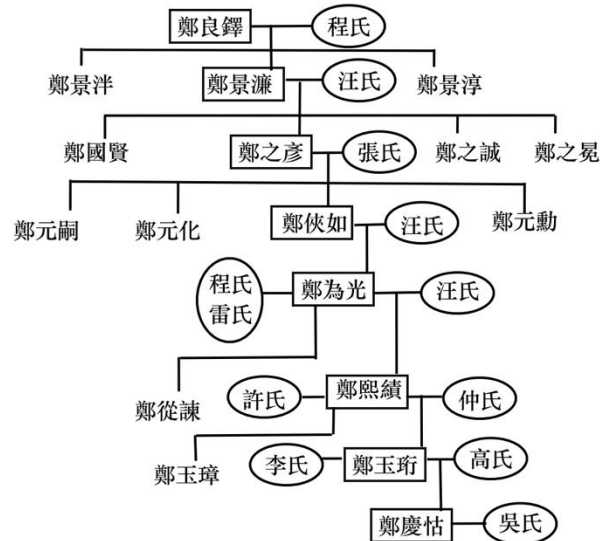
輾轉回到商賈之手。咸豐年間，休園毀於兵火。²¹²當年俠如苦心打造的「休」園，不意竟從「休止」，甚至走向「終止」。園林終究無法避免消散於各種因緣力量的衝擊，此為主人預料中之「不常」宿命。那麼，文字是否相對可保持不朽？乾隆三十七年《揚州休園志》刊刻後，旋即遇上清廷展開大規模徵集、禁毀行動，²¹³由於園志中出現前朝遺民人物如冒襄、杜濬，以及受到乾隆晚年怒斥的沈德潛，²¹⁴使得本為壯廣家聲的文字工程，反而招致不測之禍。當時鄭氏家族成員一併被禁毀的著作，還包括鄭俠如《休園詩餘》、鄭熙績《含英閣詩草》、《花嶼詩鈔》、《晚香詞》、《蕊樓詞》，文禍之甚，幾乎網羅家族世代重要著述成果。以身為讀者的後見之明來看，《揚州休園志》的編寫策略，過於突出鄭氏在士人群體的身份象徵，卻無法有效緩和政治網羅收束時突如其來的強大壓力和快速衝擊，較諸休園毀圮，此難更艱，致使鄭氏一族喪失了面向公眾的話語權與家族文化資本。原本慶怙心期文字不朽能承載「常」之意，終究不幸落入了「不常」。或許，這是鄭氏後人欲藉文字以「發前人之光」的強烈企圖心中，未曾思慮到的「休」之本意，不禁讓人喟然再三。

²¹² 蔣超伯〈閱李艾塘《畫舫錄》有感〉提及：「休園本鄭俠如園，後歸程氏，咸豐初，包氏修之，未幾付兵火。」見許少飛：《揚州園林小史》，第90頁。

²¹³ 據吳哲夫研究，乾隆禁書分為前後二期，前期為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十六年，此時尚無實際禁錮文士之跡象。後期為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特別乾隆五十三年，令纂《四庫全書》，趁機全國性大規模查抄書籍。參氏著：《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頁85。《揚州休園志》於乾隆三十七年（1773）成書出版，恰值乾隆下詔查抄之時。

²¹⁴ 據姚觀元所提：《揚州休園志》因內含沈德潛、龔鼎孳序文而被抽燬。見〔清〕姚觀元：〈外省移咨應燬各種書目〉，《清代禁燬書目四種》，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第2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32。

附錄一：《揚州休園志》八世系譜圖（作者自繪）



附錄二：《揚州休園志》中的家族女性紀錄

| | | | |
|----|----|-----|---------------------------------------------------------------------------------|
| 壽序 | 俠如 | 母張氏 | 艾南英〈鄭年伯母張太君六十壽序〉 陳繼儒〈鄭母張太君七十壽序〉 |
| | | 妻汪氏 | 王猷定〈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鍾鼎〈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劉肇國〈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許之漸〈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
| | 熙績 | 母雷氏 | 張玉書〈鄭節母雷太君五十壽序〉 張恕可〈鄭岳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王揆〈鄭節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
| | 玉珩 | 母仲氏 | 張學林〈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吳煒〈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
| | 慶怙 | 母高氏 | 沈德潛〈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宮煥文〈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

| | | | |
|-------|----|-------|--------------------------------------------------------|
| 傳、誄 | 俠如 | 母張氏 | 姚思孝〈鄭母張太君傳〉 范景文〈鄭母張太君誄〉 |
| | | 妻汪氏 | 申維翰〈鄭水部配汪太君傳〉 |
| | | 女兒鄭氏 | 陳堯勳〈程孝子啟善聘鄭氏貞女傳〉 王光魯〈貞女鄭氏誄〉 |
| | 為光 | 妻汪氏 | 繆 彤〈鄭侍御配汪太君傳〉 |
| 墓誌、祭文 | 俠如 | 母張氏 | 鄭元勳〈先妣張太夫人行述〉 馮元飈〈鄭母張太夫人墓表〉 |
| | | 妻汪氏 | 鄭俠如〈亡妻汪孺人行畧〉 |
| | | 女兒鄭氏 | 鄭俠如〈哭字程氏亡女文〉 |
| | 為光 | 高祖母汪氏 | 張玉書〈誥贈榮祿大夫潔潭鄭太公暨一品夫人元配汪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
| | | 母汪氏 | 徐元文〈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任工部司務崇祀鄉賢俟菴鄭公暨敕封孺人元配汪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
| | | 妻汪氏 | 李天馥〈敕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崇祀鄉賢晦中鄭公暨敕贈孺人元配汪太孺人繼配程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
| | | 妻程氏 | 徐元文〈祭鄭年嫂程孺人文〉 |
| | 慶怙 | 妻吳氏 | 汪孟翊〈祭鄭姻母吳恭人文〉 鄭慶怙〈哭亡妻吳恭人文〉 |
| | | | |
| 行狀 | 俠如 | 母張氏 | 鄭元勳〈先妣張太夫人行述〉 |
| | | 妻汪氏 | 鄭俠如〈亡妻汪孺人行畧〉 |
| | 熙績 | 母汪氏 | 鄭熙績〈先妣汪太孺人行述〉 |
| | | 母雷氏 | 張恕可〈鄭節母雷太恭人行狀附行述〉 |
| | 玉珩 | 母許氏 | 鄭玉珩〈先妣許太恭人行述〉 |
| | 慶怙 | 祖母仲氏 | 鄭慶怙〈先祖妣仲太恭人行述〉 |
| | | 母李氏 | 鄭慶怙〈先妣李太恭人行述〉 |
| | | 妻吳氏 | 團 昇〈鄭氏吳恭人行畧〉 |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唐〕李德裕：《李衛公別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崇禎年間刊本。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明萬曆年間世經堂刊本。
-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86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清〕江藩、姚文田等纂：《嘉慶重修揚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第41輯，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清〕李斗撰，涂雨公、汪北平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姚覲元：《清代禁毀書目四種》，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第2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清〕夏燮：《明通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秦國璋：《寄暢園志》，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2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影印民國五年抄本。
- 〔清〕陳鶴：《明紀》，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
- 〔清〕鄭俠如：《休園詩餘》，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 〔清〕鄭熙績：《含英閣詩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清康熙含英閣刻本。
- 〔清〕鄭慶怙：《揚州休園志》，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25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 〔清〕錢泳著，張偉校點：《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近人論著〕

- 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食貨》第15卷第9、10期，1986年4月，頁435-445。
- 王穎：〈「廢興惟視詩書力」：論休園的文學空間意義〉，《安徽大學建築學報》第26卷第5期，2018年10月，頁94-99。
- 王鴻泰：〈明清間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年3月，頁1-44。
- 朱衣仙：〈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第34卷，2017年12月，頁1-48。
- 江藝平：〈現代族譜體例探索〉，《臺灣源流》第94、95期，2021年5月，頁17-26。
- 衣學領主編，王稼句編注：《蘇州園林歷代文鈔》，上海：三聯書局，2008年。
-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
-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
-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 李仁淵：〈從史料到文本——族譜與明清地方社會研究〉，《中國史學》第25卷，2015年10月，頁85-97。
- 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289-344。
- 周啟榮：《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以倫理道德、儒學經典和宗教為切入點的考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 胡汝民：〈試論家譜研究及其資源開發〉，《臺灣源流》第46、47期，2009年6月，頁29-38。
- 倉修良：《譜牒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7年。
- 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
- ：〈寄寓、歸守與出離——寓山三賦對主人與園林關係的思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3期，2005年11月，頁35-70。

- ：《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9 年。
- 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 年。
- 許少飛：《揚州園林小史》，揚州：廣陵書社，2018 年。
- 許烺光著，王芃、徐隆德譯：《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出版社，2001 年。
- 都銘：〈意義與空間原型的形成——揚州休園修葺研究〉，《建築遺產》2021 年第 4 期，頁 29-34。
- 陳永明：〈降清名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97-228。
- 陳從周：《揚州園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1983 年。
- 游勝輝：〈遺民·逸民·鄉紳：明遺民二代蕭伯升之家聲延續與志意詮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99 期，2023 年 5 月，頁 103-145。
- 趙橙：《內外之間：明清園林中的閨秀空間》，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21 年。
- ：〈虛實相生：明清圖繪文本中所見之園林與性別空間（16~19 世紀）〉，收入陳嘉禮、林稚暉主編：《論道稷下：新材料、新方向下的中國文化》，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23 年。
-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潔觀念的嚴格化》，《文史叢刊》之 10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8 年。
- 馮爾康：《清代宗族史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年。
- 馮劍輝：〈明清徽商「脫賈入儒研究」以歙縣長齡鄭氏為中心〉，《黃山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2008 年 8 月，頁 19-26。
-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04 年 12 月，頁 387-419。
- 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 年。
- 葉叡宸：《地因人重，即景見心：清代地方園林志的典範追尋與文本重構》，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 年。
- 廖慶六：《譜牒學研究》，臺北：萬卷樓，2013 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作為一種現象的遺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

社，2014 年。

蔡佳穎：《鄭元勳影園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9 年。

談家勝：〈徽州族譜所錄文獻的類型與價值〉，《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 38 卷第 5 期，2010 年 9 月，頁 554-558。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香港中國學社，1971 年。

羅時進：〈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與問題視閥〉，《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顧一平編：《揚州名園記》，揚州：廣陵書社，2011 年。

何炳棣著，巫仁恕譯：〈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59-76。

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的研究〉，收入《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年。

韓德琳著，曹曄譯：《行善的藝術：晚明中國的慈善事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年。

大木康著：《冒襄和《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出版社，2013 年。

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 年。

梅爾清（Tobie Sarah）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安東籬（Antonia Finnane）著，李霞等譯：《說揚州 1550-1850 年的一座中國城市》，北京：北京聯合出版，2022 年。

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安斯加爾·紐寧（Ansgar Nünning）主編，李恭忠、李霞譯：《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

The Fabrication of Clan Mark: The Family Memory and Text Construction

Ye, Ruei-Chen*

[Abstract]

The Monographs of Yangzhou Xu Garden is a family record of the Zheng family in Yang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focusing on gardens as the core of his writing,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ancestral lineage, construct family traditions, and shape the ancestors, showcasing the "glory of the family."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spatial significance of Xiu Yua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irtues, ethics, and philanthropic practices praised by traditional literati. Moreover, it will further interpret how "Monographs of Yangzhou Xu Garden" depicts the profound memory images of the Zheng family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Finally, by contemplating *The Monographs of Yangzhou Xu Garden*,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arden as a form of "family discourse" at that time. It aims to view the familial consciousnes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hope to reveal the meaning of self-expression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local scholar-bureaucrat famil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Keywords: Xu Garden, Yangzhou, *Monographs of Yangzhou Xu Garden*, Fabrication, Family Memor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